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朱杰 唐旭明 彭慧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世红 陈思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张刚强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任世红

目 录

2019年 第6期 总第122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王 芳

责任编辑:鲍跃华 王 芳 龚万达 郭晓东

王天海 蒋建忠 徐晓婷 宋 好

本刊特稿

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

——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 杨卫敏

04

中华文化

画开“新金陵” 传立百年身

——读《宋文治传》 / 萧 平

12

发挥安徽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对策研究 / 钟 艳 李 霞

15

试论“民胞物与”之人文语境下的生态关怀 / 刘晓潇

20

政党制度

新中国70年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实践路向 / 崔 珏

2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几点经验 / 梁晓宇

30

新时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基于S市X区的调研分析 / 张 星

37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网 址:<http://jssyb.chinajournal.ner.cn>

电子邮箱:jssyxb@163.com

电 话:025-84287236

传 真:025-84287236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非公经济

- 江苏民营经济 70 年发展经验启示 / 江苏省工商联课题组 43
- 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探讨
——基于广西贺州的调查 / 龚 晨 51

民族与宗教

- 改革开放 40 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研究 / 吴似真 57
- 信教群众的健康管理策略研究
——基于江苏省 A 市 N 区基督教信众的调查 / 赵骏骏 季国忠 64

学习与思考

-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工作 / 潘国政 68
- 新时代发挥统战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的路径研究 / 陈明太 缪文新 裘如君 73
- 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活动对其文化价值提升的作用
——以中国科举博物馆 2017 年运营以来的研学活动为例 / 蔡 颖 78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4 * 2019 - 12

治理共同体视阈下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

——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研究

杨卫敏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特别是中央作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要积极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在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在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如参与乡贤参事会等)。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围绕中心大局,找准切入点着力点;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关键词:县级政协;基层协商;互融互促;社会治理;平台建设

中图分类号:D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6-00004-0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以改革思维、创新理念、务实举措大力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努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提出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要求“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基础,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优势明显、责无旁贷。特别是县级政协作为最基层的政协组织必须把服务社会治理作为履职的重要内容,才能与时俱进地提升履职水平和能力。2019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以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展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探索

收稿日期:2019-11-02

作者简介:杨卫敏(1965-),男,浙江台州人,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浙江省政协特约研究员。

政协协商同社会治理相结合等新形式,拓展政协协商参与面,扩大界别群众工作覆盖面”。本文以浙江省各级政协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对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衔接渠道形式及如何促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作点初浅的探讨。

一、县级专门协商机构与基层协商治理的高度契合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特别是中央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策后,以协商促治理成为乡村基层协商的落脚点和归宿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是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2]。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尤其是乡村治理离不开各方面的参与,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县级政协从网络构建、工作内容、职能建设都面临重要拓展机遇期。

一方面,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引入协商理念、协商机制和协商资源。一是用民主协商的理念方式搭建平台渠道,畅通各方利益诉求。当前,作为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代言组织的各种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承担了许多原本属于政府的职责,共同实现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过程,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体系。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县级人民政协可以在平台、载体、渠道、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二是用民主协商的机制弥补“一选了之”的缺陷,促进基层实现民主善治。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民主选举不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部,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都要配套完善起来,同时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3]。在乡村社区要建立健全协商机制,必须“倡导协商精神、培育协商文化,引导群众依法表达意见,积极参与协商;帮助城乡居民掌握

并有效运用协商的方法和程序,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城乡社区协商的良好氛围”^[4]。在此过程中,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人民政协特别是县级政协,不仅可以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很好的制度平台和借鉴做法,而且可以帮助提升城乡居民参与协商的能力。三是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寻求最大公约数,促进科学决策和社会和谐。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曾经说过,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和民主协商的办法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5]。经济社会转型期出现阶层分化、利益调整、思想多元、矛盾凸显、诉求增强等特点,迫切需要运用协商治理加以解决。当前,基层统一战线网络组织齐全、成员众多、代表性增强,作为基层统一战线组织,县级人民政协联系各界群众、反映基层诉求的任务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重。特别是不断涌现的体制外的新阶层人士专业水平高、界别特色鲜明、需求诉求多样,人民政协应将其纳入工作视野,延长工作触角,发挥界别委员作用,加强引领沟通,广泛汇聚共识和智慧。四是用民主协商的人才形成“鲶鱼效应”,激活基层协商治理。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政协委员是参与协商的优质资源,没有人比政协委员更想协商、更懂协商、更会协商。中央文件明确指出:“要发挥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积极作用,引导基层群众开展协商活动”^[6]。综上所述,县级政协是助力基层协商的独特重要渠道,在服务社会治理方面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把握新方位新使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推动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作为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对于县级政协在新时代找准定位、明确方向、拓宽履职渠道意义重大。一是可以有效促进县级政协释放专门协商机构潜能和效能。政治协商包括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两种形式,在县级由于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较少,政党协商往往较难开

展,因此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就更为突出,县级政协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能更好释放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潜能和效能。二是可以有效彰显“人民政协为人民”的本质属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推进七种渠道的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政协工作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7]。“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8]县级政协大量工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与基层协商有着天然的联系,县级政协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能更好地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互融互促。三是可以有效推动县级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坚持发扬民主与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9]。双向发力是人民政协履职的一体两面,特别是对于县级政协来说,一头联系党和政府,一头联系基层各界群众,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一方面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向各界群众讲透,另一方面把各界群众的诉求呼声及时向党和政府反映。在这一过程中,助力和参与基层协商,既可以有效延长工作手臂,拓展联系面,增强思想引领的针对性有效性,积极探索五大关系和谐在政协界别中的实现形式;又可以更好凸显县级政协协商经常性、制度性、广泛性、多层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县级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二、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治理互融互促可行性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需要完善制度机制。人民政协要广泛联系和动员各界群众,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要鼓励和支持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界别群众,及时反映群众意见和建议,深入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10]汪洋主席在中

央政协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不同市县政协承担的统战工作情况不一样,而围绕当地的中心工作和民计民生等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开展协商的任务都很重。要以专门协商机构为抓手,把开展协商作为市县政协的主要工作。”如何促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互融互促,推动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是新时代县级政协的一个重大课题。新世纪以来,各地县级政协积极探索开门办政协,包括邀请群众旁听政协大会、设立委员工作(会客)室、开展与网民互动,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说,这个问题尚需从理论上进行系统廓清,在实践中进行顶层设计。

(一)在县级政协层面要搭建互融互促的总平台

县级党委出面的政治协商中,由于政党协商相对薄弱,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功能更为凸显。而县级政协协商虽属于政治协商的范畴,但大量议题与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相关。同时,县级政协委员大多来自基层各行各业,广泛联系着基层各界群众。因此,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社会协商互融互促不仅十分重要和必要,也是切实可行的。实际上,浙江温州瑞安市政协从2007年开始搭建的“榕树下协商”,运行十多年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近年来,在浙江省政协倡导和推动下,全省县级政协开展“请你来协商”活动,为县级政协与基层协商、社会协商互融互促搭建了总平台。一是实现协商主体的融合。党政领导、政协委员、各界群众、相关部门这些原来分属各个协商渠道的协商主体,现在可以汇聚到“请你来协商”这个总平台上来,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最大公约数”。二是实现协商选题的融合。各种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都可以纳入“请你来协商”的目录,改变了政协协商“软、大、空、虚”的形象。三是实现了横向协商与纵向协商的融合。基层协商是分层级的纵向协商但又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横向协商,在如何破解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矛盾方面存在一定短板,这也是一些基层协商难以达成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政协特别是县级政协具有的界别广泛性和委员层次性,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陷,破

解这一问题。如：杭州市江干区政协创新构建“1+N+X”协商平台体系：“1”即高标准搭建一个区级总平台；“N”即高质量设立若干个分平台，依托政协各界别、各专委会、各街道工委（委员小组），灵活经常地开展各类协商；“X”即依托委员民情联络站（工作室），借助网络议政、远程协商融入新媒体平台，有效扩大协商的参与度和开放度，积极推动“有事好商量”进社区、进楼宇、进市场、进工地、进学校，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政协离得很近、委员就在身边^[11]。四是实现了专业协商与利益调处的融合。基层协商更多的是利益调处，而对一些专业问题的论证并不具备优势。人民政协所具有的人才资源优势可以有效补齐这一短板。如：杭州市江干区建设应用型政协智库，切实增强建言靶向性和资政含金量。平阳县政协对一些特殊的议题，邀请有关专家学者、行业能人、村居干部等各界各阶层代表人士和群众代表参加。五是实现了组织协商与网上协商的融合。坚持开门协商、开放协商，结合固有的协商议政平台和协商工作安排，综合运用各种新媒体新技术，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协商方式和途径，打造开放式协商平台，把更多群众诉求纳入有序政治表达轨道，以达到协商效果最优化。台州三门县政协借助移动新媒体技术，将“请你来协商”与三门智慧政协平台相结合，依托委员移动履职平台、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等宣传阵地，探索通过多媒体融合实现双向发力的有效办法^[12]。“请你来协商”平台所采取的“线上+线下”模式，有效扩大了协商的参与面。如：2018年9月，湖州安吉县围绕“实体经济与安吉发展”这个主题，首次以融媒体直播的形式，让县委书记与政协委员面对面协商，浏览量达9.4万人次，参与互动976人次；同年10月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专题协商会，再次以融媒体直播形式召开，浏览量达10.5万人次，参与互动985人次，得到界别群众的广泛关注和支 持。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社会组织人士的参与，促进了县级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互动发展。

（二）乡镇街道应打造“政协+统战”协商平台

注重发挥委员“一线”作用，将履职触角延伸到各乡镇街道，把协商平台搭建到百姓家门口，真正把基层协商的“最后一公里”筑牢做实，这是人民政协服务社会治理的有效探索。基层协商民主中的乡镇街道协商是指乡镇街道党（工）委和政府（办事处）就区域范围的重要事项与各界群众进行的协商。但相关文件并没有明确这一层级的协商由哪个部门牵头指导和组织，从浙江省情况来看，近二十年来各地牵头部门五花八门，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也有政协牵头的，但大多是自发的，在做出成效后得到当地县镇两级党委政府认可并授权。其中，浙江省委统战部曾在2013年到2015年在全省范围内推动这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13]。目前，不少地方这项工作仍由统战部门牵头指导并形成了较大优势。如：在台州市县两级统战部门牵头指导下，在全市乡镇街道全部建立了经社会各界协商推选并由党组织聘任的各界别代表人士为协商员的乡镇街道民主协商会，聘请36000名协商员（议事员），近几年来开展协商活动达6000次。

与此同时，浙江部分县（市、区）乡镇街道一级协商也曾授权政协牵头协调，但在委员联络室（配有领导和专职干部）这一政协在乡镇街道的常设机构撤销以后难以为继或效果大打折扣。现在一些设在乡镇街道的委员工作室和会客室开展的联系各界群众的做法，实际是县级政协协商平台的延伸，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基层协商。镇级政协委员联络组如何参与和服务基层协商，浙江省一些县市区在实践探索中创出了“政协+统战”模式。事实上，基层人民政协和统一战线在资源和理念、功能方面存在许多重合或相通之处，在组织框架和网络队伍上各具优势，履行职能作用上各有侧重，在平台载体渠道方式上各具特点^[14]。整合两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可以在推进基层协商治理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目前，乡镇街道一级党（工）委普遍设有负责统战工作的党委委员（近年来不少地方设专职统战委员，如：近年来台州市全市乡镇街道专职统战委

员增配 76 名),并配有统战办公室和统战干事,这就基本上可以填补委员联络室撤销后乡镇街道政协工作无人做的机构人员空白。一些地方抓住这一契机积极促成两者融合。如:温州市鹿城区、台州温岭市和衢州龙游县都明确规定,乡镇街道书记联系政协工作,统战委员(前提是安排为政协委员)负责政协工作。在此基础上,要求镇乡街道政协委员联络组活动必须坚持务实创新,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主要形式包括:组织本区域委员列席当地党代会(党员代表会议)、人代会等重要会议;听取镇(街道)党政领导和相关单位关于工作情况的通报,知情明政,建言献策;组织委员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座谈、研讨、恳谈、监督等活动,深入了解情况,主动反映民意,积极研究对策建议;探索建立委员联络室、委员工作室、委员信箱、委员接待群众、社情民意收集点等机制,促进委员了解民情、收集民意,等等。

台州市各县(市、区)是近十年来统一战线全面、持久、有效参与乡镇街道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地区,其重要成果就是全市各乡镇街道普遍建立了统一战线协商议政组织,这就为人民政协在乡镇街道一级开展协商提供了依托平台。2019年6月,台州市政协与台州市统战部联合发出《关于推进“请你来协商”平台向乡镇(街道)延伸的实施意见》,在全市各乡镇街道全面推进“统战+政协”协商平台和机制建设,系统推进基层常态化民主协商。其主要做法是:各乡镇(街道)根据工作实际,依托县(市、区)委统战部指导建立的民主协商议事会和所在乡镇(街道)的政协委员(或者是联系该乡镇街道村居的政协委员),由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牵头,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和渠道开展协商活动,促进基层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反映并妥善解决。“政协+统战”的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在共同确定协商主题中体现协作。聚焦乡镇(街道)工作要紧事、民生改善实事、基层治理难事,注重选择切口小、关

联广、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开展协商。在选择协商主题时,可以采用党委政府点题的方式确定主题,也可由政协委员公开征集选题。选题经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审定后,由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选题牵头政协委员协商制订实施方案,向县(市、区)政协、县(市、区)委统战部备案。二是在协商全程体现协作。在组织和参与调研过程中体现协作,坚持“不调研不协商”原则,围绕协商议题,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深入群众听民声、深入研讨出真知;对协商议题中敏感的问题、多年积累的难题,政协委员在调研中要主动向乡镇(街道)汇报情况,乡镇(街道)应提前与相关部门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组织和参与协商建言中体现协作,召开“请你来协商”对话会,会议由乡镇(街道)统战委员和选题牵头政协委员共同召集,邀请党委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乡镇(街道)有关负责人、界别群众代表和利益相关人士代表等参加会议;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现场介绍情况并回应相关意见建议,促进多向沟通协商,广泛凝聚共识。在报送协商成果中体现协作,会后及时汇总整理协商意见建议,以协商纪要或其他形式向乡镇(街道)报送协商成果,推动协商成果转化为党委政府决策、民生实事项目或者改进基层治理等方面的内容,协商成果抄送县(市、区)政协、县(市、区)委统战部。三是在建立持续跟踪问效机制中体现协作。各县(市、区)政协和县(市、区)委统战部均建立与各乡镇(街道)“请你来协商”活动的工作联系机制,及时掌握活动开展情况,推动协商成果落实。各县(市、区)政协对协商建议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可通过组织委员开展民主监督、调研视察、民主评议等形式跟踪办理情况,通过再调研、再视察、再协商,推动协商成果落到实处。四是在明确建制分工中体现协作。县(市、区)政协建立和完善政协委员联系乡镇(街道)机制,确保所有乡镇(街道)政协委员联系全覆盖,保障协商活动有效开展;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通过“请你来协商”平台的搭建,不断丰富乡镇(街道)民主协商议事会内容,把常态化乡镇(街道)民主协商制度进

一步坚持和完善好。统一使用“请你来协商”标识,助推工作精品的打造、“政协+统战”特色品牌的培育。五是在规范协商周期和频次中体现协作。围绕乡镇街道重大事项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每季度开展一次协商活动,每年举办4次以上协商活动。其中,邀请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参加1次协商活动,其他协商活动邀请分管负责同志参加。县(市、区)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和县(市、区)委统战部班子成员每年至少参加乡镇(街道)协商活动1次以上^[5]。

事实表明,采取“政协+统战”模式不仅能有效发挥镇乡街道委员联络组在基层协商民主中的独特作用,而且对县级政协提质增效有着积极促进作用:一是有利于人民政协更加紧密地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和统一战线成员,充分发挥其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二是有利于人民政协广聚人心、广集民智、广谋善举,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共同维护团结稳定大局;三是有利于人民政协拓展工作空间,延伸工作触角,完善工作格局,扩大政协影响,提升政协形象。

(三)村和社区要找准政协委员参与服务“三治”融合的补位渠道

基层协商中的村和社区协商不是简单的参政议政,更多的是村民和居民的利益调处,因涉及基层党建和自治制度,因此有关文件明确由县级组织部和民政部门牵头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层政协在村级协商中无所作为,而是必不可少的补位。党的十九大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了村级治理要走“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道路,从而促进基层善治,这就为基层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和服务村级协商治理提供了契机、明确了方向。

基层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在促进村(社区)实现“三治融合”方面优势明显,关键是准确定位、精准补位但不越位,这样就可以从中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因为普通村民个人的法制意识、道德水平、专业知识和表达诉求的能力都有一定局限性,而各界人才荟萃的基层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是促

进“三治融合”、实现村级善治的优质资源。基层各界政协委员通过政策宣讲、法律服务、专业指导、道德引领,可以有效引导群众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三治”融合。最近,台州市路桥区政协把“一村一委员”作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融合互促的重要方式,开展“一村一委员”民主监督暨“请你来协商”活动,进一步突出委员在基层协商中的重要作用。临海市政协依托“一村一委员、一界一委室、一季一协商、一年一考评”的“四机制”,加强“请你来协商”平台机制化建设,推进界别协商和委员联村工作常态化开展^[6]。

当前,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治理逐步由经济能人型向乡贤治村型转变。一些地方成立村级乡贤参事会,是对村“三委”(党支部、村委、监委)和村民说事、村级协商恳谈的必不可少的补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是农村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村“三委”班子精力有限,在农村治理中投入相对不足。二是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突出。村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明显,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农村成为传统宗族力量以及灰色势力的主要集聚地,治理难度越来越大。三是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具有独特优势。与村“三委”班子相比,乡贤所处的位置相对超脱,在品行、威望、资金、专业知识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参与乡村治理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进而探索建立起以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机制。事实上,乡贤中不少是政协委员和统战成员,通过乡贤参事会,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参与乡村治理,可以让乡村协商意识增强、协商水平提升,让乡村协商不仅成为必须而且可行、有效。乡贤参事会应成为政协协商与村级民主协商相融相促的有效平台和载体,政协和统战部门应在这方面加强配合和探索。

与此同时,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还可以通过民主监督形式保障和促进乡村治理健康发展。在这方面,金华全市建立的“一村一委员”民主监督是一个精准有效的补位平台和机制。一是监督重

点民生化。把目标锁定为农村,重点监督事关乡村振兴的剿灭劣 V 类水、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村级 365 便民中心建设等民生实事。二是监督内容具体化。根据政协委员民主监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落实情况,制定了《政协委员民主监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五看五问”明细表》,整个表格细化成 100 个问题。三是监督工作制度化。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在媒体开辟工作专栏,建立工作微信群,使委员履职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四是监督成效最大化。针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之初存在的“前期分类不到位、中期运输不分类、后期处理一锅烩”现象,通过“五看五问”进行全程监督、现场监督、持续监督,使这项工作不断推进。

总之,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在精准补位、有效助推村级协商治理向“三治融合”升级方面发挥重要积极的作用。

三、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统筹推进七种渠道的协商民主发展。基层政协积极参与和服务基层协商、社会协商,可以为基层群众、社会组织与党政部门搭建“连心桥”、开设“直通车”,起到了为党政部门拓宽联系群众的渠道、为广大群众表达诉求提供途径、为委员履行职责搭建舞台一举三得的作用。当前,要在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协章程前提下,大力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确保这项工作不守旧、不走偏、不越位、不停滞,充分展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一)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和定位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运行。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责任,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突出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牢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要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做到找准定位不越位,精准补位不包办,体现特色不变样,坚持建言资政

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扩大各界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比如,当前浙江乡村治理已初步创出特色:村级小微权力规范体系+村民说事+乡贤参事+文化礼堂+乡贤馆——稳步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方向迈进。在村级协商治理中,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参与其中虽然是补位,但这个补位必不可少、十分重要。要正确处理乡贤参事会与村“两委”的关系,正确处理村级协商治理中乡贤与村民的关系,既不越俎代庖直接干预村务,也要积极以提建议、作调解、做示范等协理方式助推治理,积极融入“村民说事”等基层协商平台,参与乡村协商民主实践,有效提高农村重大事项决策效率和村级事务执行力度。

(二)围绕国计民生,找准切入点着力点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强调,要努力使专门协商机构“专”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人民政协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聚焦党政中心大事、改革发展要事、民生改善实事、社会治理难事,注重选择切口小、关联广、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开展协商,听取有关部门、群众意见和建议,并现场协商解决。要坚持人民性,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多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做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特别是县级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和服务基层协商,必须围绕民生大事、关键小事,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党委政府重视、人民群众关注、有关部门主动,推动问题的解决和落实。要坚持开放性,提倡广泛参与,邀请界别群众代表和利益相关人士代表参与协商议题征集或参加现场协商活动,扩大协商参与面。根据议题,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议政性协商,增强协商的开放度和时代性。

(三)注重实效、创出品牌,以点带面开展工作

要强化问题导向、实效导向和精品导向,因地制宜、创出特色,努力培育互融互促的品牌。坚持数量适度、质量为首,精选协商议题、深入开展调研、摸清真实情况,切实做到说实话、献实策、求实效,通过协商议政、平等对话,增进共识、汇聚力

量。以我国民主恳谈的首创地台州温岭市为例,市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物业管理专题恳谈会,将民主恳谈形式融入政协协商之中,并且实现线上线下的实时互动,拓宽了政协吸收和征集社情民意的渠道,探索形成有温岭政协特色的恳谈式协商议政新模式。在此基础上,温岭市政协将专题政治协商、界别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各类协商方式统一纳入“请你来协商”平台,研究并规范议题选择、参与方式、协商过程以及共识达成等环节设置。2018年市政协开展“物业管理”专题恳谈,并列入专项民主监督;2019年跟踪协商,从而促进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四)加强规范化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鲜明特色和一大优势,可以在互融互促中促进基层协商的规范化建设。2019年3月底,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专门就“请你来协商”出台指导意见,规范协商主题、协商流程、协商建议办理机制、持续跟踪问效机制、协商频次等,为“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建设标准和制度保障。而湖州安吉县出台“政协协商工作规范”,将标准化引入政协工作中,确保“请你来协商”实现“五个有”,即:“请”有机制、“你”有范围、“来”有场所、“协”有重点、“商”有成效”。要着力推动协商活动制度化,对协商的议题提出、参与主体、议事规则、意见汇总、办理反馈等,乡镇(街道)应形成固定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使规范更加明确,程序更加严密,切实增强协商民主的实效性。

(五)建立健全工作格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氛围

基层协商涉及方方面面,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部门配合、各方参与的格局,努力形成各方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要努力提升服务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一方面,政协委员要强化主体意识,努力提升参与协商特别是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政协组织

要积极帮助委员提升服务和参与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要坚持统筹发动、上下联动、左右互动、内外协同,把“请你来协商”与政协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和委员视察、专项监督等工作有机整合和结合起来,把“委员会客厅”、应用型智库等政协资源统筹利用好,发挥综合效应,提升整体水平。乡镇(街道)要完善协商机制,务实有效组织协商建言。县(市、区)政协、县(市、区)委统战部要积极支持乡镇(街道)“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协商活动有序开展提供保障,推动协商成果办理落实。同时,积极联系宣传部门加大对乡镇(街道)“请你来协商”活动的宣传报道力度,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让更多群众关注、参与、支持“请你来协商”活动。

参考文献:

- [1][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9-22(2).
- [2] 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求是,2019(11).
- [3]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381-382.
- [4][6]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EB/OL].(2015-07-22).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7/22/c1001-27345883.html>
- [5] 习近平.之江新语[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26.
- [8][9][10]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9-21(2).
- [11] 沈吟.省政协创建新平台 激发基层政协活力——无论大小事请你来商量[N].浙江日报,2019-04-30(7).
- [12][15][16] 蔡铭耿,周大彬.立体协商 一线协商 开放协商——台州市政协全域推进“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综述[N].联谊报,2019-06-25(2).
- [13] 杨卫敏.从“温岭模式”到浙江特色——浙江省各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启示[J].观察与思考,2016(7).
- [14] 杨卫敏.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责任编辑:宋好

画开“新金陵” 传立百年身

——读《宋文治传》

萧 平

摘 要:今年是宋文治先生诞辰 100 周年,周和平先生创作了《宋文治传》以纪念文治先生八十年人生与艺术的成就。作为“新金陵画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宋文治的人生与艺术历程始终与时代变革紧密相连,他摸准时代脉搏,推动了山水画创作由“旧”向“新”的转变。传记通过对大量资料的考察和展示,以兼具专业性和艺术性的笔调,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真实、鲜活生动的文治先生。

关键词:宋文治;新金陵画派

中图分类号:J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6-00012-03

今年是宋文治先生诞辰 100 周年。自去岁岁尾始,南京、深圳先后举办了先生的作品大展,开展了对其艺术成就的研讨会,出版了大型画册《百年宋文治》。在我的脑海中,文治先生生动的、和蔼可亲的形象再度浮现了。我与先生相识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江苏省国画院(“总统府”西花园内),他是老师,我是研修班的学员。“总统府”东侧的门向东箭道 50 号,文治先生就住在那边一间约 20 平方米的小屋里。课余我时去探望,或看他作画,或欣赏他收藏的海上诸多名家的作品。他家隔壁住着镇江过来的丁士青先生,丁先生光头蓄须,颇似罗聘笔下的金冬心。青年时期的这些琐碎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的。以后,我在南京博物院工作近 20 年,1981 年又回画院,记得还是文治先生亲自

去到南博通知我办理调动手续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与已经退休的文治先生曾同客金陵饭店,徐邦达老师也时时来住,谈艺论画,殊有兴味。前前后后近 40 年间,我与文治先生的联系未曾间断,无论做人、为艺,受益可谓多矣!

现时,我的画案上正放着周和平先生刚刚完稿的《宋文治传》。翻阅中,那些熟悉或生疏的过往,一幕幕、一页页都在记忆里流淌。人生百年,多少历史的人与事,多少兴衰与变革,要为一位先贤立传,要记录其人生和事业,要探究其思想与情感,要真实、可信,还要有趣、可读,真是谈何容易啊!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两年多的孜孜不倦,以一己之力成之,我要为和平兄点赞!

我始终认为,新中国的第一个画派诞生在江

收稿日期:2019-11-01

作者简介:萧平,江苏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

苏南京,而非基础与实力格外雄厚的北京与上海,必有其特殊的原因。这个原因则来自画派的主要参与者和开拓者,宋文治即是其中之一。那么,个案的研究定能得出必然的结论。

他的艺术启蒙来自于娄东这块积淀丰厚的艺术土壤。太仓是清代“四王”中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的家乡,“娄东画派”的诞生地。虽然在文治先生出生的时代,陈独秀正对山水画正宗的“四王”进行激烈的批判,改良中国画,“革王画的命”,但太仓人对于“王画”的继承、发扬却从未停止。因此自他稚嫩地拿起画笔,所见、所学的都不会超出其范畴,可以说他绘画启蒙的“第一口奶”便是“王画”。水乡太仓的文化氛围,与距之不远的20世纪30年代十里洋场大上海的五光十色,尤其是江南文化精英们对于“四王”代表的传统艺术的迷恋,后来都在他的早期绘画中产生过影响,而这恰恰铸就了文治先生的绘画根基。

他的人生和艺术历程与时代变革紧密联系。传记把他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以生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展示了中国百年来社会的急遽变化中,宋文治从一个弃婴成长为国画大家的不凡经历。在他80年的人生中,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两个时代。在他的青少年时期,尽管怀揣艺术梦想、执著与努力,却难真正登上艺术的正途。是新中国、新社会,才有了让他施展才艺的大舞台,从一个江南小县的美术老师成为省国画院专业画师、享誉画坛的国画大家。

不屈的生命、顽强的抗争完成脱茧化蝶。传记描绘文治先生在时代的跌宕起伏中奋力前行的身姿,那是他的一段段与命运抗争的故事。他的抗争、奋斗、顺应、迷惘和醒悟,凸显了他个人的特殊际遇。传主是一个从育婴堂抱来的弃婴,抱养他的又是一个贫困之家,他从小就受着苦难的磨砺。因为出生卑微,饱受屈辱;因为贫困而失学;因为家庭变故,学徒养家。那段时光,经济上困顿,人格上被轻视,但却始终对人生抱有憧憬,不甘平庸,顽强抗争。当努力与奋斗,事业小成,他发现“社会人士比以前对我客气了”!从被人看不起,到脱茧化

蝶,成为闻名全国的画家。他的经历告诉人们:人生无坦途,苦难也是一所“学校”。人生没有直路,事业之途多崎岖,唯有不忘初心,持之以恒者,方有成功的希望。

新时代、新使命、新山水与晚年变法。随新中国而来的新风俗、新理念,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画精英圈子中沾沾自得的笔墨情趣,却给立根未稳的文治先生带来了崭露头角的新机遇。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摸准时代脉搏,为时代鼓与呼,在创作上开始山水画由“旧”向“新”的转变。“我想画一点新山水”是文治先生在新中国初期的愿望。“他所描绘的新山新水,如果归结到一点,就是突出了山水和人的关系”(蔡若虹)。在新山水的创作上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之后,晚年依然坚持变法,反映了他艺术上永不满足、永不停顿的可贵品质,也折射出中国画命运的跌宕起伏,见证了江苏国画发展的轨迹。宋文治是一个缩影,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尤其是在“新金陵画派”孕育产生的过程中,他是参与者,是开拓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传记中的宋文治,是一个有胆识、有情义的血肉之躯。过去,在许多熟悉先生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循规蹈矩、小心谨慎的人。其实他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日军侵占中国时期,他是一个有民族正义感的青年,曾冒险救助地下党;在安亭中学时掩护印传单的进步学生,这是他的凛凛正气、侠肝义胆。然而由于所生存的环境因素、世事变故、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的现实,人们眼中的“旧知识分子”,又使他不得不思虑缜密,谨言慎行。即便如此,他的内心仍坚守着人格的节操,以及在亚明先生被调查时,他不落井下石;在“黑画”事件中坚守信义。

传记为我们展现的文治先生在艺术创作上的另一性格:大胆变法,敢于突破,标新立异。文治先生的艺术风格和创造性,包括对他在题材上的突破,尤其是太湖、黄山、三峡的创作中,多有自己的艺术语言;笔法上,他兼及南北,以造化为依据。传记对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历时3个月,途经23000里的旅行写生,不惜笔墨,加以浓墨重彩的

描绘，最后道出了它的特殊意义：“它成为山水画在服务现实生活中进行革新的成功例证而载入中国画史。”

还应该注意，传记中有些重要的史料，既是研究文治先生艺术的重要资料，更可以印证江苏国画在新中国的发展轨迹，特别是“新金陵画派”的产生和发展。对包括“大跃进”在内的“红色经典”题材如何看待，艺术界和社会上有着很大争议，作者并没有回避，而是通过认真辨析，认为既要看到当时党和政府对国画艺术的重视，给中国画史续上新篇章，也要看到当时某些“乌托邦”式的作品，离艺术越来越远了。我们对画家在激情、夹缝和困惑中创作的一些作品要加以珍惜，认真研究、发掘其中蕴含的文化艺术因素和历史史料的价值。书中还引用文治先生在深圳的一次座谈会的发言，对当年“大跃进”进行了反思。对以往研究的空缺，如他的中小学美术教育的思想、他的课徒观点等，也做了考察与归纳，都具有珍贵的研究价值。

书中对文治先生革新名作《山川巨变》的阐述，从 1959 年的《三门峡》到 1960 年的《山川巨变》，他的创作历程，所存数量及去向等，都做了细致的考察，更记录了赞扬与批评两方面的声音，增强了学术探讨的成分。作者经过梳理考证，对文治先生进入画院以后的“异军突起”做了细致的描述。从作品的影响、组织的认定和社会评价诸方面，认证早在“文革”以前，文治先生的山水画已经具备了全国性的影响。

从文治先生的学艺、交游，引出的众多同时代艺术圈的精英、名流。不多的笔墨，却让人感到可亲、可敬，个性鲜明。其中包括他的老师张石园、吴湖帆，亦师亦友的陆俨少，还有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陈佩秋、唐云、钱瘦铁、来楚生、徐邦达、吴白匋、许麟庐、黄永玉、黄苗子等，都与文治先生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与交往。书中披露了他与这些

艺术家的交往细节与书信内容，殊为珍贵和难得。尤其是与亚明先生长期共事的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友谊；与陆俨少先生师友情谊中发生的故事，已经超越世俗的认知。在写到参观杜甫草堂时，自然切入：“他对杜甫的认识来自陆俨少。”因论及俨少先生的名作《杜甫诗意百开册》，兼及文治先生得之于陆老的《杜陵诗意册》，这样的联想与串联，把一个单纯的事件，丰富有趣起来。这部《杜陵诗意册》，40 年前我曾向文治先生借临过，阅到此处自然生出了亲切感。

本书的作者周和平先生，是文治先生艺术的热忱赏鉴者，作者本人即是江南人，在江南文化中浸淫既久。他的文笔犹如自身的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文辞优美，语言雅致，不激不厉。对文治先生各时期的代表作的赏析，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感悟力；所写文治先生的收藏、戏曲、美食部分，既有专业性，又具艺术性。同时，对国画艺术有着鲜明的审美取向，这是本书的特色——充满江南风雅的气息。我一直以为，文治先生的艺术无论从旧与新的角度看，都是属于江南的。我高兴地看到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文字都透着江南式的风雅。

我与和平兄相识近 30 年，深知他从政之余，乐与文化艺术界人士交往。他身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博学谦和。记得不轻许人的沙曼翁先生为他题写过“人淡如菊”，称赞其人“极醇厚”，这让他艺术界有了一大批朋友。和平兄政务之余坚持写作，笔耕不辍，成果丰硕。他先后撰写出版吴贻芳、宋玉麟的专著和大量书画评论，又创办《雅集》艺刊，备受业界称赞。他的这部《宋文治传》，孜孜矻矻埋头两年多时间，现在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相信同样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书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亦凝聚着玉麟、玉明兄弟家族的心血！

责任编辑：王芳

发挥安徽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对策研究

钟艳 李霞

摘要:安徽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省份,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具有文化产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本文从时间积淀、空间布局、资源禀赋、存在样态、成就贡献五方面揭示安徽地域文化资源的主要优势,分析研判了安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发挥安徽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发展壮大文化产业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安徽地域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战略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15-05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以文化繁荣助力民族伟大复兴,文化建设也要提升至更高的层面,肩负起更多的使命。安徽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省份,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以安徽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努力构建具有安徽特色文化产业,对安徽地域文化资源的整合、转化、发展和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徽地域文化资源的主要优势

安徽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省域,地域文化资源丰富,主要有以下优势。

(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自史前文明时期直至当代,安徽文化资源的产生和累积从未间断。距今200万至240万年前的繁昌县人字洞遗址、和县猿人、巢县早期智人等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安徽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后,安徽经济和文化重心也呈现出自北向南迁移的过程^[1]。先秦至唐宋时期,安徽江北地区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涌现出诸多思想家和文化名人,如老子、管子、庄子等,产生了《道德经》、《庄子》、《管子》、《淮南子》等重要著述。唐宋时期佛教文化繁荣,九华山佛教得到了大的发展。唐宋以后,由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思想文化的发展日渐活跃,逐渐形成了新安理学、桐城

收稿日期:2019-10-08

作者简介:钟艳,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地域文化、品牌管理;李霞,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专职副主委,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宗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2017-2018年度招标课题成果(编号:ZB201708)。

文派、皖派朴学等著名学术流派。这种早期的史前文化和自北向南演进和变迁的轨迹，形成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安徽文化。

(二)分布广泛,结构匀称

历史上,安徽文化沿着自北向南演进和变迁的轨迹,形成了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三个区域文化。学术界将这三个区域文化分别命名为“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三大区域文化圈以淮河、长江为界,自北向南涵盖了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域空间,形成了大量的地域文化资源,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古器物等物质文化资源,和各地遗存下来的思想、学派、名人、著述、民间音乐、舞蹈、传统戏剧、传统制作技艺等非物质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布局自然,覆盖全面,分布广泛,结构匀称。

(三)资源丰富,特征鲜明

安徽境内山川秀美,风光旖旎,拥有黄山、九华山、齐云山、天柱山、琅琊山、采石矶、太平湖、巢湖、桃花潭、花亭湖等风景名胜。安徽的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拥有黟县古民居、棠樾牌坊群、许国石坊、凤阳明皇陵、明中都城、寿县古城、李鸿章故居、亳州花戏楼等历史古迹。安徽素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革命旧址较多,如淮海战役总前委、涇县新四军军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渡江战役总前委、独山和金寨革命旧址群。此外,安徽的民俗资源和戏曲资源也都十分丰富,可谓地域文化资源门类众多,丰富多样,特征鲜明。

(四)形态多样,层次完整

除了具备传统地域文化资源,安徽还具备出版发行、演艺广电、印刷复印、动漫游戏、广告会展等新兴文化业态,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的文化企业和集团,如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安徽演艺集团、芜湖方特欢乐世界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地域文化资源日益丰富完善,形态兼顾传统与现代,层次清晰完整。

(五)成就卓越,影响巨大

安徽历史上曾有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名家大家,如老子、庄子、管仲、华佗、曹

操、曹植、曹丕、朱熹、方苞、姚鼐、张廷玉、王茂荫、黄宾虹等。安徽也曾孕育出诸多杰出成就,如原始法学的创立、道家学派的形成、中国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芍陂的修建、理学的集大成、徽商文化的形成、新安画派的形成、桐城文派的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发轫等等^[2]。有着辉煌历史的安徽,曾经创造出的成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

二、目前安徽文化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安徽省文化产业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文化产业成绩斐然。但在发展过程中安徽文化产业也存在短板,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六不”。

(一)文化产业总体规模不大

近年来,安徽全省文化产业在积极探索中逐步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基础。2015年至2017年,安徽省文化及相关产业机构数由14264个增至16684个,年均增长为8.2%;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由100413人增至112800人,年均增长为6%。2015-2017年间安徽省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提升。201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833.7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79%;2016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976.3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2017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088.2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03%。2015-2017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幅超过10%,高于同期全省GDP增幅,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总体看来,安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文化产业机构数、从业人员数逐年增长,文化产业增加值逐年提升,连续3年来保持超过10%的增速,占GDP比重达到4%,但文化产业整体规模小、实力弱、贡献率不高,距离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占GDP比重所要达到5%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产业总体规模不大,离支柱性产业还有很大差距。

(二)文化产业结构不平衡

近年来,安徽文化产业领域不断扩大,全省文化产业广泛涉及到文化用品制造业、文化用品贸易业和文化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但传统行业过重,

核心主业不强,新兴产业乏力,文化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在国家认定的文化产业十大门类中,安徽文化产业在“工艺美术品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等传统文化制造产业所占比重较高;“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等现代文化产业和产品的比重偏低,档次不高;“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发展较为滞后。例如:2017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文化批零业和文化服务业企业分别为1138、465和751家,实现营业收入1625.4亿、583.7亿和421.9亿元,产业结构由上年的62.9:22.1:15调整为61.8:22.2:16,文化制造业居于主导地位^[9]。文化产业大部分集中在包装印刷、工艺品制造等传统文化制造业,新兴企业较少,传统企业较多,文化产业结构不平衡性明显。

(三)文化产业集聚度不高

安徽文化产业大项目、好项目较少,规模较大的文化企业数量不多,缺少龙头企业和领军企业的带动。目前,安徽省文化产业已组建了安徽出版集团和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新媒体集团、安徽演艺集团等大型企业或集团。据安徽省统计局统计,2017年,全省2354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631亿元,同比增长12.7%,比全国、中部分别高出1.9个和1.6个百分点^[10]。2019年5月,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均第10次被认定为“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与此同时,民营文化企业科大讯飞、芜湖方特、再芬黄梅、禾泉农庄等企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截止2016年底,安徽省文化产业法人单位数总计60172个。虽然说目前初步培育了一批企业集团,尤其是通过重组,新闻出版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文化产业集聚度不高,竞争力不强。从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开展的2017年度安徽民营文化企业100强推选活动中,摘取前10强名单可看出,安徽省民营文化企业点多面广规模小,规模较大的企业数量过少,龙头企业偏少,企业知名

度不高,缺乏一批标志性的龙头企业和品牌产品,文化企业的市场主要在省内,不具备区域性影响力,在国内外的传播地域和影响力也还非常有限。

(四)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文化产业的创新,包括了文化产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等。安徽是文化资源大省,除了黄梅戏、文房四宝等优秀传统文化,如今,科大讯飞、影星巨幕、“共享书店”、“时光流影”等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已成为安徽文化领域创新创造的新名片。但相对于文化资源禀赋充足的省情而言,目前一方面安徽文化资源转化利用程度不高,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力度不大,大部分文化产品立意陈旧,方式呆板。如目前我省文化资源多偏重于静态模式,主要为图片宣传、遗物展示等,缺乏通过技术、创意、产业化方式进行推广,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教育培训、书籍出版、影视动漫、主题公园等方面的衍生产品。另一方面文化产业模式落后,以数字出版、动漫游戏、数字影视行业为主导的新型文化产业业态比较缺乏。此外安徽文化企业创新能力相对不足,2011年至2013年期间,安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专利授权量占全省专利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8.2%^[11]。整体形成了文化产业附加值不高,高科技含量不高,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很少,精品力作和文化品牌也较少的现状。

(五)文化产业政策支撑体系还不够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消费需求日趋旺盛,成为新的兴消费热点。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进一步健全,文物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进一步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品牌逐步树立,这些变化也需要进一步形成全面覆盖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尽管目前安徽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良好,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了《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若干意见》、《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安徽省“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等旨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但产业政策支撑体系尚不完善,没有完全形成覆盖体制、人

才、金融、融合的全面扶持政策,迫切需要文化行政部门加强与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科技、国土、商务、教育、广电、新闻出版等部门的协调合作,整合各种资源,形成政策合力共同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六)文化产业市场服务监管机制不够健全

随着文化消费需求的日趋旺盛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重大投资和招商项目越来越多,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文化产业市场服务监管体系。2017年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实施意见》,围绕当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本省实际,提出了具体推进措施。但就总体来看,当前文化产业市场服务监管机制依旧不够健全,一方面,缺乏完善的市场准入政策,各类项目的投资标准和经营方式并不完善,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市场准入政策;另一方面,缺乏以信用为核心的市场监管体系。

三、发挥安徽地域文化资源优势发展壮大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

(一)实施“文化+”战略,推进安徽地域文化资源跨界融合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跨界融合”已成为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最突出的特点。

实施“文化+实体经济”战略,让文化资源“活”起来。要促进安徽地域文化资源与农业、工业、旅游等相关产业相互交融。比如推进文化+农业,深入挖掘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人文资源为导向,结合地方民风民俗,打造突出本土特色的资源项目。推进文化+制造业,对一些涉及民风民俗、民间技艺,可以推动其形成特色产品和工艺品加工制造。推进文化+旅游,以文化内涵提升旅游项目、旅游产品、旅游节庆的吸引力,增加体验、休闲、养生、欣赏等旅游内容。推进文化+教育培训,将文化资源特别是本省红色文化资源与教育培训行业进行融合,开设访

古研学、干部教育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推进文化+新业态,积极培育文化、创造、艺术与实体经济跨界融合。

实施“文化+科技”战略,让文化资源“动”起来。推动文化资源和科学技术的融合。针对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大背景,将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信息通讯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相融合,通过两者融合,用科技促进文化产业产生新样式、新产品、新服务,创造新的文化业态。对安徽现有历史人文资源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充分利用当地资源,运用科技手段,通过现代技术呈现崭新的表现形式。如以文化创意、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作为载体,将各地域的历史文化、民俗文化、传说故事、民间工艺、戏曲舞蹈等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还原、展示和演绎,让“老树开新花”、“嫁接出新果”,更加形象生动地呈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底蕴和特色。

实施“文化+资本”战略,让文化产业“强”起来。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安徽文化企业的扩张,形成规模效应,培育一批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让文化产业“强”起来。一方面可以发挥政府资金的引领作用,通过设立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和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引导和吸引各类资本依法参与文化企业的生产运营,发挥政府资本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社会和民间资本,减轻政府的投资负担,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实施“文化+金融”战略,让文化产业规模“大”起来。产业的发展,需要金融对产业强有力的推动,文化企业重创意、轻资产,融资能力比其他生产类企业弱,尤其对于轻资产新兴文化创意企业,融资更是一大难题。实施“文化+金融”战略,通过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吸引金融和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的重点领域加大投入,给予税收优惠和服务保障。可通过加大直接融资,提高文化产业上市比例,进一步发挥上市平台的优势。也可通过与正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对接,寻求众筹支持,解决传统金融难以解决的问题。

(二)强特色补短板,促进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安徽文化资源多样性特点明显,应根据安徽不同地区文化特色,推动各地文化产业错位发展,优化文化产业布局和结构,促进文化产业协调发展。一是合理规划产业布局。从地理分布上,安徽山水文化资源富集于皖南,红色文化资源集中于皖西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皖北历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新兴文化产业主要集中于合肥、芜湖、马鞍山。可以根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优先发展其主导的文化产业,同时强化自身薄弱领域,自觉开发新的领域,兼顾发展其他文化产业。二是均衡调整产业结构。针对于新兴企业较少,传统企业较多的现状,在凸显各地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培养创新意识,开发新的领域,利用新媒体,通过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等多元方式优化传统文化资源。同时对新型文化产业,如数字动漫产业、现代传媒产业、广播影视演绎产业等给予大力支持,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保证文化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和新兴文化业态协调发展。

(三)完善政策体系,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政策的支持是推进文化产业继续发展的助推器。一个完整的产业政策需要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建立相应的财政金融、人才培养、市场监管等机制来实现。一是应当尽快建立相关的法规,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设立文化产业发展法,将安徽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产业发展等作为立法内容,使安徽文化产业发展有法可依。二是需要形成覆盖体制、人才、金融、融合的全面扶持政策,构建党和政府全面扶持、多部门协调的政策联通网络,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安徽文化产业与科技、旅游、金融等产业的融合。三是在文化产业政策设计规划上,应注重对安徽文化产业“引进来”与“走

出去”的优惠性政策设计,吸引国内外文化企业来安徽投资交流,注重提高“引进来”的层次与水平,拓展安徽文化产业交流平台,同时提高本省企业“走出去”的能力,利用好省内外、国内外的资源和市场,寻求各方合作,为“走出去”提供各方面的政策支持。

(四)健全市场机制,为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应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机制。健全市场机制,一是要构建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推动文化市场各行业建立完备的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运行规则,提高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二是要构建文化市场信用监管体系,制定文化市场红黑名单制度,鼓励遵纪守法经营,推动行业诚信自律,激励市场活力,促进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进程中,我们要以安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坚持合理开发、科学利用、传承创新的原则,不仅要传承和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更要担负新的使命,持续推进文化创新、产业升级,使其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得到有效衔接,在全国打响“徽”文化品牌。

参考文献:

- [1] 卞利. 略谈安徽地域文化的流变和形成 [N]. 安徽日报, 2016-01-25.
- [2] 《安徽文化史》编纂工作委员会. 安徽文化史[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3] 安徽数据 [EB/OL]. (2018-07-04). <http://data.ahtjj.gov.cn/sjjd/1921.jhtml>.
- [4] 安徽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千亿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N]. 安徽日报, 2018-10-24.
- [5] 2015年发展安徽文化创意产业的调查与建议[N]. 安徽日报, 2015-07-20.

责任编辑:宋好

试论“民胞物与”之人文语境下的生态关怀

刘晓潇

摘要:中华文化在感性体证与理性认知之初,就以一种主客合一的整体性思维逻辑,实现了人与自然在源起上的“合一”,铸就了中国凸显生命关怀的文化伦理和人文语境。“民胞物与”作为张载对儒家“仁”论的高度概括,将人对自身、对同胞的态度推演到对待外物和自然生命上,开显出“万物平等”的生态前提、“仁爱人道”的生态伦理和“穷神知化”的生态路向。

关键词:民胞物与;万物平等;仁爱人道;穷神知化;生态关怀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20-04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探讨的原始命题,或者说文化就发端于人类对天地以及自身在天地中如何安置的拷问。在这一拷问下,中西方文化开显出不同的路向,西方文化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将“征服”作为面向自然的基本态度,在神学与自然科学大放异彩的同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异化”;中华文化则在理性认知与感性体证之初,就以一种主客合一的整体性思维逻辑,实现了人与自然在源起上的“合一”,铸就了中国凸显生命关怀的文化伦理和人文语境。中国人对自然生命的现实关怀,以一种超前理念的形态,成为现当代环境治理理论的先导和内核。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本体主张,到“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政治诉求,再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现实操作,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一以贯之的经世之学中被演绎得尤为和谐。

“民胞物与”作为张载对儒家“仁”论的高度概括,将人与自身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和人与外物的关系定格在宇宙生发的整体规律中,将人对自身、对同胞的态度推演到对待外物和自然生命上,并将其具象化为尊长慈幼、一视同仁的礼仪体系,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现实关怀中剥离出生态关怀的志趣,开显出“万物平等”的生态前提、“仁爱人道”的生态伦理和“穷神知化”的生态路向。

一、“民胞物与”开显出“万物平等”的生态前提

张载是北宋时期理学的先驱之一,他在研习儒家经典和佛老玄学的基础上构建起一套以“气论”为内核的宇宙本体论和理学心性论,重新开启了以肯定世界客观物质性为思维前提、以阐明世间万物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为理论归旨来探讨宇宙万物之本原的哲学路向。在“论太虚、统有无、一体

收稿日期:2019-11-01

作者简介:刘晓潇,山西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与中华文化。

用、合内外、言气化、辩一两”的本体思辨下,推演出“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太和篇》)、“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诚明篇》)的“天地之性”,并以此为介质将宇宙万物的气化之道、变易法则与道德修习统辖于儒家“性与天道合一”的“天人合一”主旨,构建起“一天人,立大本”的儒学新体系。张载哲学体系所追求的天人、物我一体,集中体现于其“民胞物与”的《西铭》境界。《西铭》原为《正蒙·乾称篇》的部分内容,张载曾于所居书房东西两牖各录《乾称篇》的一部分《砭愚》和《订顽》作为座右铭,后程颐将《砭愚》改称《东铭》、《订顽》改称《西铭》。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谓:天创造万物、为万物之父,地生成万物、为万物之母;作为个体存在的每一个人,对天地而言只是沧海一粟,得天地之幸以混迹其间,“我”的形色之体、自然之性都得之于天地之气,“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所以,天地之生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同胞血亲,自然万物都是“我”的同类同伴,“我”并不具有超越于其它自然生命的优越性、特殊性和至上性,宇宙万物在本原上是平等的。由此,“世间万物皆平等”成为“民胞物与”的第一个逻辑结论。自然万物都是“我”的“一父一母同胞”,意味着人类在起源上并不具有凌驾于其它自然生命之上的“主体性”,人类与其它自然生命一样由宇宙法则生成、受宇宙法则规囿,无分物我、不设尊卑、不较高下,所以平等相待、尊重保护、合理开发才是对待自然生态的正确态度。

在张载哲学体系下,“世间万物皆平等”还有一个预设的逻辑前提,即对宇宙发展趋势“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之“太和”状态的基本判定。张载认为,从终极状态上来看,宇宙发展是辩证统一与总体维和的,万事万物之间的矛盾对立冲突是暂时的、平衡协调和谐是必然的,矛盾斗争的规律不是“一斗到底”而是“仇必和而解”,这一规律亦运行于人类社会的各类关系中,二元对立或多元

分化的斗争思维是违背宇宙生成规律的,人对自然的无限征服是违背天地生成之道的。由此,张载哲学从自然与社会规律运行的逻辑起点处,开显出人与自然平等相待、和合相处、共生共存之生态关怀的本原性前提。

生态治理的前提和关键是生态观念上的治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人类在物质获得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人类的物质获得却以自然生态的失衡为代价。按照环境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环境以及各物种之间存在着能量、物质与信息的守恒定律,能量、物质、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在特定时间内应该是对等的,一旦各要素的特定比例关系和稳定功能结构被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出现整体性崩塌。在人类将自身作为主体过度介入生态系统之前,系统内部各要素是可以维持自然平衡状态的,但随着人类将自身主体性无限放大,对环境资源和生物资源予取予求,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造成生态失衡并最终自食苦果。究其根源,正在于近现代以来作为世界文化发展主流的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和人对自然改造征服的价值取向。故在现当代生态治理课题日益重要的发展语境下,主张“世间万物皆平等”、以主客合一为基本思维结构的中华传统文化将发挥特殊作用,这一作用首先体现于思想观念源头上的治理。

二、“民胞物与”开显出“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

张载哲学体系传承了儒家学说一以贯之的经世情怀和现实关怀,构建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的生命哲学。张载认为,“太虚之气”是万物统一的根源,秉“湛一之气”而生的人之本性即为“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无偏无颇,是“善”之本源,故“善”是人之天性。但在现实操作上,人虽然具有先天善性,却未必得以“成性”,只有通过以德制气、以理制欲的修身养气之道,才能返本成性。返本、知礼、成性则要“大其心”以“尽性”,《大心》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诚明》中亦言“惟大人能为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圣贤之心通达天地、如太虚之大,

只有大其心方能体认天下万物、合天道之心、泛爱众物。由此,泛爱众物、仁爱人道成为“民胞物与”的第二个逻辑结论。仁爱和人道精神是《西铭》境界的主要伦理诉求,这一诉求源起于“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凸显于“天地之性”的人性论,实现于“天德良知”的道德论。在《西铭》中,张载将儒家“仁爱”的价值理念由家庭血缘关系下的孝悌友爱推演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一切关系中去,将兼爱、博爱精神挥洒至“民胞物与”之极致,力图以“仁爱”为主线,通过由“乾父坤母”到“民胞物与”再到“仁民爱物”的逻辑递进,来整合以家庭、社会与自然为基本结构的宇宙秩序。由此,仁爱精神与人道主义,也就成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原则。

“仁”,从人从二,谓“二人以上”,是儒家处理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核心理念。基于民胞物与、万物同根的基本设定,张载顺利完成了由“亲亲”到“仁民”到“爱物”的递进,形成了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将道德关怀从社会族群延伸到自然生命的生态伦理学。“爱物”,意味着人作为秉天地之性而生的道德性存在,不仅要对他履行忠孝仁恕的道德义务,还要对自然万物发挥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所谓“生态”,意谓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且存在的就是美好的、合理的,秉天地之气而生的自然万物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客观上来说,人类可能是宇宙生成的最高智慧物种,但不是最高物种,对其它物种的绝对征服是非理智、非道德行为。或者说,正是基于先天生成的、区别于其它物种的智慧和道德禀赋,也就先天生成了人类在继续生态平衡上的责任与使命,这也是中国生态伦理学的主旨。

近现代以来,工业文明发展主题使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达到了极致,工业文明体系下人对自然的对立甚至敌对态度以全球性生态危机收尾,昭示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严重的道德缺位。在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诸多诟病中,人道主义缺失是其主要的矛头指向,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以“民胞物与”的博爱境界完

成了对西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超越。“仁民爱物”的“人道”伦理导出了生态治理的道德主体,也就是说,在生态治理中,人类虽然不具有本原意义上的主体性,但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主体性,人的自觉与自律是生态治理的主体性保障,而人的自觉与自律又以人对自然万物一视同“仁”的人文认知与道德关怀为前提,这是由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的先天“善”性所注定的,也是由人“爱必兼爱、成不独成”的返本成性之道所注定的。

三、“民胞物与”开显出“穷神知化”的生态路向

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理念在张载哲学体系中得到了明确的命题式叙述,《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张载哲学的一切叙述,都以达致“天人合一”为最终归旨。故,天人、道性、物我的“合一”是《西铭》的最高境界,而天与人、道与性、物与我在主体之道德实践和理性认知中的“合一”是有一个兑现过程的,这个过程由“先识造化”、“穷理尽性”、“穷神知化”三个基本阶段构成,这三个阶段同时构成了张载哲学的“三昧境”,将其本体论、认识论、道德论串联为一体。

“先识造化”,意谓对宇宙运行规律的基本认知,在张载那里即是对“太虚即气”之宇宙“气”化规律的认知。《太和》言:“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气”是宇宙万物的根基和起始,气之聚散则为世间万物,万物有始终而“气”无生灭,万物之属性功能皆为“气”之聚散隐现,“气”之浮沉、升降、动静保持“太和”的总体趋势,其所生世间万物亦在胜负、屈伸、虚实、刚柔、阴阳之“一物两体”的对立统一中变化无穷,故“气”化世界是一个物质统一、矛盾变化、生生不息的“太和”世界。穷尽宇宙物理,方可尽人之本性,所谓“穷理尽性”。天地万物均由“气”化成,人作为万物之一亦是如此,人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善”与“恶”的矛盾统一体,要变化气质、返天地之善性,则要“大其心”、“不以见闻梏其心”,实现“见闻之知”向“德性之知”(即经验感知向价值认知)的升华,所谓“穷神知化”。人的最高境界与最高使命,

是“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世间万物与我一体、天道即为人事。故,作为“气”化之存在,人应该尽力扩充天地赋予之道德本心,通过内修自省、乐天安命、履行道德义务与社会责任,实现“穷神知化、与天为一”的最高价值。如此,“民胞物与”大境界观照下,“识造化”、“大其心”、“与天一”层次递进的修行路径,为现当代生态治理开显出完整的治理路向。

“识造化”,揭示生态治理的基点在于“知天而为”,即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掌握。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存在,是自然万物生存发展的必然趋向和本质联系,人为无法创造亦不能消灭。中国文化由其源起处,就显示了对自然规律的探求意志,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地文、人文都是对宇宙万物生成法则和生存样态的记录与表述,即对自然规律的记录与表述,即对生态的记录与表述。生态治理的首要步骤,就是在经验感知和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观察、认识、理解、把握生态系统各要素发生发展的必然趋向以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轨迹和本质联系,如:生物适应环境规律,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调发展规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系统发育进化规律,等等。对规律的认知和掌握,是尊重与顺应规律的前提。

“大其心”在生态治理语境下,即意谓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所谓“道法自然”,人事之道要遵循自然之道。对自然规律达成基本认知与掌握之后,中西文化在如何运用规律的命题上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西方文化以人类的至上性和万能性为价值定向,走上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道路;中国文化则感念宇宙生生之“大德”,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揭示,主张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自然法则,并将自然秩序演化为道德秩序一气贯通到个体修行中去,提炼

出诸如“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顺时而为、顺势而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等生态治理原则。

“与天一”指示生态治理的最终指向,即在认知规律与顺应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人人共治”推动人与自然的亲密互动,进而达致“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所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人与自然基于生成本原而来的天然联系在此境界下昭然若揭并自然流露,无需治理而自然有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境界学,人生有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四种境界下,人分别依照自然本能行事、依照自我欲求行事、依照道德规范行事、依照宇宙规律行事。依照宇宙规律行事,也就到达了天地境界,在此境界下人性与天道合一,人得以充分体悟生命之源的善与美,与自然达成一种天然的融洽与和合,如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天地境界是生物存在的最高境界,要达致这种境界,就需要每一个生命个体参与到生态环境的治理中来,所谓“人人参与、共治共享”。生态治理是全球性、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在治理主体上,既需要政府的主导、社会的响应,更需要作为生命基本构成单位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道德主体性,在“民胞物与”的天地境界中继续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

参考文献:

- [1]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M].北京:三联书店,1996.
- [2]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
- [3] 罗军.中国人的文化仰望[M].北京:中华编译出版社,2016.
- [4] 赵林.启蒙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5] 刘学智.中国哲学的历程[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宋好

新中国 70 年多党合作制度发展的实践路向

崔 珏

摘 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考察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实践路向,主要呈现四个特点:统一战线的结构特征,协商民主的运行方式,服务大局的制度目标,优化治理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实践;发展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24-06

一国政党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发展,要与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相适应,要受政治制度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目标,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不可能是竞争性的;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吸纳甚至同化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条件而实行的新型政党制度。考察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实践路向,这一制度呈现四个突出特点:统一战线的结构特征,协商民主的运行方式,服务大局的制度目标,优化治理的发展空间。

一、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结构特征相一致

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统一战线是不同

政治力量基于共同利益、为了共同目标而结成的政治同盟,统一战线的建立必然依托聚合的组织。中共统一战线的起点是政党合作,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启了革命统一战线实践,第二次合作建立了两党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极大推动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

中共建立统一战线不仅着眼于团结同盟者共同实现革命的目标,在实践中还与政权建设相结合,从而使统一战线被纳入长远的制度设计范畴。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解放区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政策。毛泽东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演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1]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更强调: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

收稿日期:2019-09-28

作者简介:崔珏,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党制度、统一战线和政治发展。

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统一战线长期实践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团结合作的历史,中共将这种合作关系由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策略层次,通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确定为制度化合作,并逐步上升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当然,多党合作由政治策略向政治制度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进而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统一战线发展呈现马鞍形轨迹,多党合作制度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

鉴于多党合作制度作用的大小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重视与否,合作程度存在随意性,合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改革开放后,中共强调“为了保证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在调整多党合作失衡状态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文件推动多党合作的制度化。1989年12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这一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其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2005年2月颁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了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在政治实践中,紧密相连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都是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的多党合作制度强调坚持中共领导,又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化渠道,适度满足了各方面代表性人士政治参与的要求,对中国

现实社会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既是多党合作的重要主体,又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主党派提出要做“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其实“帮手”的提法,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统一战线同盟者的希望,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派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10]统一战线是中共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政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广泛联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具特色。

多党合作制度是一与多的统一体,与统一战线同心圆的结构特征有着相似性。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目的是“合作”、“协商”、“团结”,而不是多党对立、多党竞争,这就决定了多党之间在政治核心价值方面有着高度共识,共同的核心价值提供了政党合作的基础、目标和协商对话框架。正如统一战线强调求同存异,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不断增进一致性,正确引导多样性,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这种具有张力的统一战线结构特征,使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变迁过程彰显出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形成了对各方面精英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吸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作为执政党在经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一方面用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充当社会利益整合者,同时增强了组织对新社会阶层的吸纳能力,并向各社会群体开放政治过程,形成一党领导的开放型政党体系。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也逐步扩大其主体界别,适应履行职能的需要,同时择优、适量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代表,体现参政党对社会变迁以及新社会阶层人士参政需求的回

应。新世纪以来,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分工范围在原基础上进行了几次调整。有的党派如致公党密切联系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民革和农工党开始在参政议政重点领域发展新成员,民革补充了社会和法制以及“三农”研究领域专业人士作为界别特色,农工党主体界别范围在原来“医药卫生界”基础上增加了“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还有一些党派将相关领域学者纳入组织发展范畴。由此,多党合作制度不仅为不同政党组织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平台,也从政党制度出发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凝心聚力。

二、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发展高度契合

多党合作的主要运行方式是协商民主,多党合作在新中国 70 年历程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形成高度契合。

1949 年新政协会议拉开了新中国的序幕。各政党各界别通过会议形式协商决定国家大事来自 1946 年的经验,“政协道路”代表和平、民主的建国方式。当年中共作过这样的评价:“固然政治协商会议是党派会议的性质,其中的代表并不是由于普选而产生,但是这些代表中的一部分是由中国各政党所自行推选出来的,而另一部分无党派人士也是经过事前协商而后产生的,大体都具有代表社会某一方面的资格。所以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在中国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1949 年新政协正是以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赋予新政权合法性,会议协商产生了民主联合政府,协商建国的同时确立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党格局。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后,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各党派的协商机关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新中国 70 年发展中,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民主共同存在,相互补充,构成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共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多党合作集中体现在政权机关和政协机关,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协商。人民政协从第二届起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政治协商和团结各界人士的作用,虽是协商机关却长期与中共党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构成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四大系统。中共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工商联领导人的协商活动常规化,涉及内容广泛,协商形式有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一年一次民主协商会,主要围绕中共中央将要提出的大政方针问题进行协商;不定期邀请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高层次、小范围谈心活动,主要是沟通思想,征求意见;两个月举行一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是通报重要情况,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政策性建议。此外,民主党派还可以就国家和地方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向中共提出书面建议,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有民盟周世钊等上书中共领导人,力陈“文革”种种错误。在新中国 70 年政治发展中,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使中国政治领域呈现独具特色的民主性。

目前协商民主被视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着力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协商民主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增量民主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在恢复和发展中日益规范,协商的精神和原则也逐步由政治领域进入社会,成为一种治理资源。中共十三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以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基层治理中开始推行“民主恳谈会”等协商活动,一方面使群众开始实践以协商的形式而非极端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在主导协商活动的同时,开始体验民主行政的具体内涵,基层逐步向民主治理的方向转变。各地方政府着手提高工作的开放程度,在政策制定环节通过听证会、协商对话、专家咨询、媒体讨论以及网络渠道广泛收集民意,扩大民众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度。40 年来,协商民主从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发展到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立法协商和政策协

商,又拓展到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具体利益协商,表现出解决有序政治参与问题的良好前景。

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规范了协商民主的7个渠道: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其中要求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处于国家政治制度层面,是各政党、各团体之间进行民主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党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特色,在政党关系上以合作、协商代替了国外普遍推行的竞争方式。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推进协商的制度化、程序化,逐步将会议协商规范为更为实际的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政协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各界别代表人士参政议政的常态化机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多党合作与协商民主的发展进程不仅高度契合,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源头、重点和规范应用领域,对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三、多党合作在服务国家建设中彰显效能

中国政党的产生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需要,服务国家建设大局一直是政党制度的重要目标。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讲话中,阐述了多党合作的三方面优势,其一就是这项制度“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4]关于这一特色,邓小平曾指出:“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5]各民主党派对此也高度认同,将工作任务确定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政治目标,并实现参政党的自身利益诉求和体现自身价值。”^[6]

早在1953年,周恩来在对民革三中全会代表和民盟七中全会代表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出“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一方面要配合国家政治运动,另一方面要配合国家建设,动员成员在各自岗位上完成国家建设任务。^[7]各民主党派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先后制定了参加国家建设的工作准则,在经济和文教科技领域做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后,各民主党派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推动各级组织和成员发挥自身优势为“四化”服务。

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政党、政党制度相区别的特色之一。我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发展大局建言出力,具有推动国家建设、促进改革发展的功能。以民主党派持续20多年的“大调研”为例,各民主党派中央先后就三峡工程、浦东开发、“京九”铁路、“三农”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两岸“三通”、西部大开发、循环经济、“一带一路”建设、乡村振兴、营商环境等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考察调研,调研成果以书面形式通过“直通车”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得到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和批示。这些参政议政成果中的建设性意见大都被列入重要议程并研究采纳,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建言出力主要围绕国家建设,突出体现共识性价值取向,相比之下反映民主党派界别及所联系群众利益的还比较少。以全国政协“一号提案”为例,2003-2015年的“一号提案”均由各民主党派中央提出,由于政协提案要求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符合国家大政方针,既要反映群众需求,又要针对某些领域和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一号提案”涉及的主题均与当年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保持着高度契合,关注度高,有着很强的针对性,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和政策效应。

目前各民主党派在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与协商三大职能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社会服务,

并将社会服务置于履行职能范畴,作为民主党派参与社会建设、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方式。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于改革开放初期正式提出,基本涵义是通过经济、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法律等活动,以服务为宗旨,注重社会效益,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各民主党派相应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在之后十余年时间里,民主党派的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在科技咨询、社会服务方面。在民主党派的社会服务活动中,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实验区建设是一个成功典范。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的重要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的基础与拓展,也体现在它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现代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模式:一是控制模式,政党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方式和相关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二是交换模式,政党通过公共政策宣传和社会公关投入,换取民众更多支持和选票;三是服务模式,政党通过服务民众、团结民众,增强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认同。各民主党派发挥专业特长和优势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初步建立起服务性社会沟通模式。民主党派社会服务不同于其他社会团体与慈善组织的地方,在于它彰显了参政党的政治责任,不仅掌握了社情民意信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的关键因素,为参政议政提供资源,更是凝心聚力的过程。民主党派通过开展社会服务,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力量都凝聚到国家的中心工作上,深化对国家方针政策的理解,深化对国家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认识,客观上丰富了多党合作服务国家大局的内涵。

四、多党合作在国家治理领域获得广阔空间

进入 21 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社会-经济转型,转型期出现的各种危机,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安全和稳定,并对国家治理能

力提出重大挑战。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以及公民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尽管这些主体的作用不是等量齐观的,政府总体上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广义的政府治理也不仅仅是行政机构,而是包括执政党、人大、司法机构、政府、政协在内的治理结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对进一步提升政党制度效能提出了新课题,也使多党合作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空间。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根本作用。参政党不是直接决策者,但从协商、参与角度扩展国家治理能力的外延,从建言、监督角度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内涵。目前政党协商作为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已经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在党和政府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法治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十三五”规划等重大决策的制定出台,中央都多次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地方各级党委也致力于完善相关制度,搭建多层次、制度化的表达意见、沟通协商的平台,营造民主环境,开展真诚协商。多党合作中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一直难见成效,监督是多党合作内在的逻辑要求,又是多党合作发展中的实践难题。近年各民主党派围绕扶贫攻坚、城市综合治理等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在监督的实效性方面有所突破。推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内容,从监督执政党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角度看,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属于政

治监督;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从这一角度看,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又是围绕提高治理水平展开的监督;监督过程发现问题,地方党委与民主党派共同研究对策,更体现了合作与监督共生的制度特色。

目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在地方治理、城市治理中出现了形式多样的积极探索。为了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广州市政协2018年开始打造了“有事好商量”民生实事协商平台,围绕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在广泛调研及各方协商基础上,每年遴选9-10个具体问题,通过协商平台实现政协、政府、党派、企业、群众、专家、媒体等共同参与,彰显协商的公共性、广泛性、互动性、共识性,推动民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使政协不仅作为“专门协商机关”议政建言,更广泛联系各方,推动民生实事得到办理和落实,对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多党合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亦对新型政党制度建设提出新要求。有学者曾指出,民主不能简单地视为制度安排,实际上“民主”或“不那么民主”是政治过程塑造的,关键在政治行为者的选择

和互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执政党和参政党,都需要通过政党能力、活动方式、功能拓展适应社会变化,激发制度的新活力,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新型政党制度的新形态,彰显更加真实、更加广泛的中国式民主。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809.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46.
- [3] 中央统战部编著.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189.
- [4] 赵银平. 立“新”除“弊”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EB/OL]. (2018-03-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5/c_1122491671.htm.
- [5]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1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83.
- [6] 民革中央《中国的参政党》编写组. 中国的参政党[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140.
- [7] 《中国统一战线全书》编委会. 中国统一战线全书[M].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88.

责任编辑:鲍跃华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几点经验

梁晓宇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制度呈现出了勃勃生机与光辉前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的多党合作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其中,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前提,坚持推动理论创新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源泉,坚持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动力,坚持完善制度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保障。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 70 年;多党合作;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30-0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建立到发展,再到不断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70 年来的实践证明,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也符合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研究,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前提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最大的政

治优势,也是多党合作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缔造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自本日起成立了。他说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其实新中国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已经成立,即新政协召开的日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日期。因为新政协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能。人民政协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

收稿日期:2019-10-06

作者简介:梁晓宇,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党建设、统战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的话语创新研究》(19YJC710007)阶段性成果;2019 年度重庆市涪陵区社科规划项目《涪陵区基层组织加强政治建设的途径研究》(SKGHYBL201902)阶段性成果。

党和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各界人士一起在人民政协的平台上光荣地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面临着经济底子薄弱、资源匮乏等各种不利局面,也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点。各民主党派动员各自成员积极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来,他们之中有教师、医生、工程师、科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全部奔赴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了贡献。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创建时期,坚定地选择支持中国共产党,共同努力,完成了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神圣使命。

民主党派的发展、壮大依托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在组织建设方面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不纯、领导机构不健全、党派成员数量较少等。1950年底,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仅为11000余名。对于民主党派发展方向问题,民主党派内部也产生了分歧,有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主张解散、合并、甚至取消各党派,有的主张敞开大门无限制的发展。为了帮助、引导民主党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中共中央于1951年1月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会议拟定了《1951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帮助各民主党派于年底前完成发展党员一至二倍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真诚关怀、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组织状况得到了改善,原来人数较少和组织不健全的状况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至1953年4月,民革由一千五百余人发展到六千人,增加了三倍;民盟由五千八百余人发到一万五千人,增加了一点五倍;民建由一千六百人发展到两千三百人,增加了54%;民进由二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二百人,增加了四倍;九三学社由一百二十余人发展到八百人,增加了五点五倍;民主党派成员总计三万二千余人,发展了二倍”。^[4]从新中国的成立到1956年10月,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不断健全,领导机构不断完善,成员总人数也发展到10万人。从1957年到1977年的二十年时间,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民主党

派在组织建设方面面临着领导班子成员严重老龄化和基层组织队伍不完整的两大问题,民主党派成员数量、组织建设状况与所担负的时代使命不匹配。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予以明确的支持,要求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以积极的态度,采取具体的措施,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在组织发展中的具体问题。1979年10月,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分别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长达20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大会都选举了党派中央领导机构,为发展多党合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战胜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今天国家建设的新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从国家层面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这是多党合作服务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具体实践,也开创了多党合作共同推进贫困地区科学发展的先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支持下,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明显,民主党派成员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创办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多年来为全国数万“社会弱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农工党中央常委吕忠梅先后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修正案)》的起草、调研和论证工作,致公党原中央主席罗豪才长期致力于软法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他们都为国家和地方立法做出了积极贡献。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各民主党派经过多年革命斗争之后做出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再次证明,在当代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而实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发挥着总览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进共识、凝聚人心,以强大的合力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向前发展,这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的重要前提。

二、坚持推动理论创新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源泉

作为一种科学的政党理论,只有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展示出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双重魅力,因此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包括对民主党派性质与时俱进的界定,对民主党派职能的拓展,对政党关系、政党制度基本概念的新概括等。

(一)对民主党派性质与时俱进界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性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上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取得突破的过程”^[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主党派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党。由于民主党派的广泛代表性,并且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较为广泛深入的联系,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中国是仿照当时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共产党作为唯一政党的一党制,还是继续实行多党合作,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道路,既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进行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样,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消失了,如何定义和理解中国的民主党派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有的民主党派同志认为,既然已经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民主党派组织也完成了历史任务,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建议民主党派自行解散;有的共产党员认为民主党派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功劳微不足道,也建议取消民主党派。为此,中共中央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

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党际关系的指导方针。1956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将民主党派界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还没有将民主党派“上升”到政党层面来界定。在中共八大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都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3]“劳动者的政党”提出,指明了民主党派不是资本主义“剥削式”的政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民主党派性质的科学界定,有利于调动民主党派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

1989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对民主党派用了“参政党”的表述,明确了从党际关系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友党关系,从政权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十分明确地界定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效地回应了对民主党派政治定位上的错误认识,巩固了多党合作的理论基础,是政党理论上的一次创新。2000年12月,在全国第十九次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明确了民主党派进步性与广泛性的内涵,即民主党派的进步性体现在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党派的广泛性是同其社会基础及自身特点联系在一起的。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且指出多党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是依托社会而存在和发展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完全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提出,是我国多党合作适应新的实践发展进行的一次理论创新。作为多党合作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完善民主党性质涉及到多党合作的效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既是对民主党派社会主义性质政党的肯定,也是对民主党派

历史进步性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指明了民主党派的发展方向。

(二)“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打消民主党的顾虑,周恩来特别强调,“我们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的寿命就有多长,一直共存到将来社会的发展不需要政党的时候为止”。^[4]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有的政党,其生命周期与中国共产党一样长,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即中国社会不需要政党为止。“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有这样的认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十分融洽,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5]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民主党派被迫停止了活动,一些民主党派组织出现了瘫痪的状况。“四人帮”的成功粉碎,为恢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如何界定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中共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共同关注的理论问题。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共十二大上,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亲密。1986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新时期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任务的报告》,该报告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高度提出了“新型政党关系”的论断,即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型政党关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无法比拟的。“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派关系史上的一次创新,是巩固新时期多党合作成果的理论基调。

(三)“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如何让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习近平同志作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新型政党制度”是继“新型政党关系”之后多党合作的又一次理论发

展,反映了多党合作制的稳固和成熟,也彰显出了各个政党坚定走多党合作道路的信心。“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多党合作开始成熟地走向世界舞台,通过国际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开始向其它国家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特的优势,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文化价值、理论价值、制度价值,引导外国政党及国际社会正确认识 and 看待中国的多党合作。“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和论述,意味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中国的多党合作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创造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创新层面,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当然,让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更有益于人类的制度探索,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实践,向世界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成功的经验以及未来的前景,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体系,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不断赢得话语权优势。

三、坚持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动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是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党,对参政党建设起着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通过自身建设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着帮助、协助的作用,同时民主党派也要主动借鉴执政党建设经验。因此,坚持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动力,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多党合作的一条宝贵经验。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首先是从领导人层面开始的,中共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创始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这个阶段还谈不上“参政党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系统、架构还不完善,成员复杂多样,中国共产党则积累了二三十年的建党经验,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思想建设成效明显,执政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以领导党的身份帮助民主党派解决发展方向、组织建设等问

题。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中共中央历代领导集体围绕执政党建设的具体问题,立足于中国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成果,也产生了辉煌的党建实践成果。不难看出,中共党建学说始终走在参政党建设前列,各个民主党派也积极借鉴中共党建经验,加强了自身建设。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共中央特别重视与民主党派的互动发展,实现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的相互促进。2002年,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分批次先后展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而这个时期各个党派中央正在进行换届,中国共产党就以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做好对民主党派政治交接的引领和推动工作,而民主党派的政治交接则对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好的映衬作用。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加强参政党建设,推动执政党建设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的论断。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之间的互相促进,深刻说明了二者建设的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二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深刻体现出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合作关系。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执政党在人民群众中引起的社会效应越来越大,各民主党派加快了向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步伐。从2013年开始,各民主党派先后开展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有的民主党派进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活动,有的民主党派结合自身实际展开了学习自身历史的活动,这些举措有效地提升了民主党派思想建设的实效性;在自身监督方面,八个民主党派在积极借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党内监督条例》,并专门设立中央监督委员会作为专门的执行机构。中共十九大以来,将“政治建设”放在了党建重要位置,为各民主党派作出了示范。随即,各民主党派通过夯实思想政治基础,突出提高领导干部政治把握能力,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政治教育格局,坚持思想建党与

制度建党紧密结合,不断提高党内监督水平,将政治建设与履职实践紧密结合等途径加强新时代参政党的政治建设。

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开始强化参政党建设理论、民主党派发展理论的构建与创新。例如,中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是互相监督的关系,二者的互相监督可以促进二者的互助共进,但长期以来民主监督一直是参政党建设的一个短板。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一种建设性的“柔性监督”,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协助中共更好地执掌政权、改进工作。2016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区,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重点就贫困人口精准识贫、精准脱贫、重大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等开展民主监督。2016年7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民主党派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的政治任务,脱贫攻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赋予民主党派的一项全新政治任务,是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通过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民主党派以监督者的角度,深度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专项民主监督”的实质是将民主监督的过程变成共同发现问题、共同研究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推动政策落实的过程,变成推动贫困地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走出一条可持续的脱贫攻坚之路的过程。八个民主党派通过对接中西部八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展专项脱贫攻坚的民主监督工作,可以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反思缺陷和不足,这是为推进农村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须的艰苦实践,同时也是多党合作实践难得的机遇,是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职能的一项创新性措施。同时,近年来,各民主党派对执政党重要大政方针执行情况、国家法律实施情况等,通过各种途径和平台向执政党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出了参政党对执政党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彰显出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的实

践价值。

四、坚持完善制度是多党合作不断发展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多党合作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统一战线工作领域到国家政治制度层面,再到社会层面全面展开的一个转变历程,而不断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化发展是多党合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际上是初步形成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局面,但期间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1982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从民主党派撤出我党人员的报告》,明确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中共党员,原则上都必须撤出,这一举措有利于保持民主党派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在保持民主党派组织上独立性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建立和坚持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和座谈会的制度。改革开放为多党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1989年1月,邓小平在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成立一个要有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的专门小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6]。于是,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充分协商的基础上,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这是首次以执政党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多党合作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予以明确,该《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多党合作朝着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迈进。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总纲,使得多党合作上升为执政党党内“最高宪法”的重要内容;1993年,全国人大通过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为多党合作继续发展提供了国家法律保障,是多党合作在制度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为发挥民主党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增强多党合作的效能,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办

公厅于1993年开始增设《民主党派建议摘报》,对民主党派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报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抄送有关部门,“同时在人大、政协制定相应的工作条例,对于人大代表向人大提出的提案,政协委员或民主党派向政协提出的提案,建立了解决、落实和反馈、回复的机制”^[7]。为了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于2005年2月又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规定了多党合作中必须坚持的政治准则、阐明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内容,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和惩处做出了详细规定。

2007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面向全社会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向全社会详细地介绍了八个民主党派的历史、基本概况,指出了多党合作的基本功能和价值,标志着多党合作由政治层面开始向社会层面延伸和拓展。

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凝聚力量的功能,能够最大范围地实现团结合作,这种功能是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实现的。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选举民主,同时还实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充分协商的协商民主。通过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团结和民主主题,调动参政党及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中共历代领导人关于人民政协的观点、主张,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和发展,为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依据,它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是对世界协商民主理论的新贡献,尤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站在时代发展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人民政协的理论内涵。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

派的政治协商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2015年5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部法规,全面规范了各领域各方面统战工作,为全面加强统一战线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和法治保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条例》明确赋予了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拓展了多党合作的空间,促进了民主党派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和制度化发展。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执政党印发的第一个关于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党际协商的规范性文件,就政党协商的定位、内容、程序和机制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有力地推动了多党合作的协商制度化建设。从1993年开始,各民主党派中央以“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为基本思路,进行系统性、规模性的重点考察调研。各民主党派中央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调研报告和“直通车”的形式呈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2017年2月,中共中央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对重点考察调研进行了规范。到目前为止,“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和专题协商

会为重点,以双周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新格局的开辟,以及制定或修订委员履职、专委会工作、提案办理协商、委员视察考察、专题调研和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工作机制的运行,促使多党合作朝科学化、制度化方向发展”。^[8]

参考文献:

- [1][7] 张艺军主编. 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225、628.
- [2] 尹航.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民主党派性质认识的不断发展深化[J].北京党史,2018(6):25.
- [3]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6.
- [4]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235.
- [5] 刘仕平.世界主要国家政党政治发展历程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360.
-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32.
- [8] 刘意,钟德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发展及基本经验[J].党政研究,2019(3):86.

责任编辑:鲍跃华

新时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现状与思考

——基于S市X区的调研分析

张 星

摘 要: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不仅是民主党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基本要求,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深入了解新时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S市X区为例,总结分析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6-00037-06

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两会”期间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和党的干部人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民主党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于推动新型政党制度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新型政党制度效能也具有战略意义。从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看,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让多党合作事业后继有人,赋予新型政党制度以新的生机和活力,有利于体现和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为深入了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以S市X区的调研为基础,总结分析了民

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并提出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为做好新时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一、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从民主党的组织架构来看,地、市一级民主党派组织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某直辖市某区级民主党派组织的调研,笔者在了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现状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情况

参照2016年党派换届的年龄口径,为民主党派区委2021年换届,以及更长时间周期的建设发

收稿日期:2019-06-18

作者简介:张星,政治学博士,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

展考虑,本次调研重点关注了 X 区各民主党派 1965 年 12 月 31 日后(简称“66 后”)和 1970 年 12 月 31 日后(简称“71 后”)出生的干部。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X 区有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等七个民主党派,共有民主党派成员 2823 人。其中,1965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者 1207 人,1970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者 780 人。

中共十八大以来,X 区各民主党派的总体数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年龄结构和分布情况等得到改善,在后备干部占在职成员人数的比例、后备干部担任实职和正职的比例、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的政治安排等方面在 S 市均处前列。

(二)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调研情况来看,X 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后备干部总体数量不够充足、结构不够合理、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各个环节不够完善等问题。

1. 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总体数量不够充足

X 区民主党派在厅级、处级、科级各个层级的后备力量总体上仍不够充足,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符合换届年龄要求的处级、科级干部数量较少。

据统计,X 区各民主党派处级干部(含企事业单位干部)中 1965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者 8 人,其中正处级 1 人,副处级 7 人。各党派副处级干部普遍少于 3 人,其中民革、民建、致公党、九三学社没有此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X 区各民主党派处级干部(含企事业单位干部)中 1970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者 7 人。其中,正处级 1 人,副处级 6 人,民革、民建、致公党、九三学社均无此年龄段的副处级干部。由此可见,X 区各民主党派处级干部虽以“70 后”为主,但总体人数偏少。

X 区各民主党派科级干部(含企事业单位中层干部)中 1965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者 81 人,其中正科级 31 人、副科级 50 人。除农工党外,各民主党派在职成员中科级干部普遍少于 8 人。X 区各民主党派科级干部(含企事业单位中层干部)中 1970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者 44 人,其中正科级干部 14 人,民建 7 人,民盟 1 人;副科级干部 30 人,民革、致公党均少于 3 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统计均包含区属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民主党派干部,若仅统计公务员序列的民主党派干部,统计数据将明显缩减。例如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民进于 1965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的副处级干部 2 人、科级干部 10 人,均不属于公务员序列。

民主党派干部的培养周期相对较长,面对民主党派干部梯队建设的现实需要和 2021 年换届的迫切需求,民主党派各个层级的后备干部总体储备尚显不足。从各民主党派现有情况来看,若民革、民进等党派不抓紧培养后备干部,到 2021 年换届时,党派内部将无符合条件的主委和体制内的副主委人选。

2. 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不够合理

从调研情况来看,X 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不够合理,突出表现在年龄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等方面。

近年来,X 区各民主党派成员年龄偏大的情况已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后备干部队伍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年龄梯次结构。据统计,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各民主党派副处级干部平均年龄 49.06 岁,正科级干部平均年龄 48.26 岁,副科级干部平均年龄 46.88 岁,年龄梯次结构并不十分理想。从各民主党派 1965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的科级干部年龄分布情况来看,各民主党派科级干部中出生于 1966~1970 年之间的占半数以上。民革、民进等党派甚至出现了副科级干部平均年龄大于科级干部的“倒挂”现象。

民主党派干部在层级、行业分布上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从干部层级配置情况看,一些党派出现了正科级人数远大于副科级人数的“层级”倒挂现象。另外,民主党派在公务员系统中发展的新成员数量十分有限。近 5 年,各民主党派在公务员中发展新成员 22 人,平均每个党派每年在公务员中发展新成员不到 1 人。因此,从逐层级培养后备干

部的角度来看,民主党派干部的结构分布还需优化。

3. 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各个环节不够完善

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从运行上来说,涉及到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使用等环节。目前,各个环节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选拔视野还不够宽。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选拔方面,选人视野不宽,导致一些优秀的民主党派成员没有进入党派后备干部队伍。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委在选人用人时,会依据某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只考虑中共党员,而将一些优秀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排除在视野之外。

第二,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培养缺乏系统规划。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培养存在缺乏计划、不够系统,培训锻炼的方式较为单一,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在学习培训方面,存在培训力度不够的问题。近5年来,X区各民主党派仅有83人次参加了党派市委主办的中青班,6人次参加了区委组织部主办的中青班,86人次参加了区委统战部主办的中青班。其中,民盟、民建、民进、致公党四个党派5年里无人参加过区委组织部主办的中青班。

在工作锻炼方面,民主党派的后备干部除了本职工作外,主要锻炼形式是参政议政、社会服务和党务工作等,缺乏挂职、交流、轮岗等方面的锻炼机会。近5年来,各民主党派仅有5名成员有挂职锻炼的经历,3名成员有轮岗交流的经历,这就导致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培养现状与中共党委和组织部门对干部选拔任用的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民主党派干部自身条件非常优秀,但由于在培养环节缺乏相应的平台和锻炼的机会,不符合相关干部任用要求,从而错失成长机遇。

第三,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动态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各民主党派都建有后备干部人才库,但对于符合哪些条件的党派成员应该纳入后备干部名单,纳入后备干部名单的人员出现哪些情况应

该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在什么情况下纳入后备干部队伍的人员应该从名单中退出等问题,尚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予以解答。管理也是服务,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动态管理发现问题、解决需求,必然会影响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成效。

第四,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推荐使用的渠道不够通畅。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在推荐使用方面存在备而不用,或内用而外不用的情况。以科级晋升处级为例,X区2016年党派区委换届以来,各民主党派仅有2人从科级提拔到处级,可见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推荐使用的比例仍有待提高。

二、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问题归因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

从中国共产党方面看,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对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重视程度有所增强。但仍需注意的是,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仍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开展党的干部工作时,单纯地将党的干部工作等同于做中共党员干部的工作,忽视了党外干部的地位和作用。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将党外干部工作片面地理解为统战部门的工作,与本单位的组织工作割裂开,缺乏发掘、培养党外干部的主动性,未能领会“把一部分优秀人才留在党外”的深意。个别基层领导干部甚至认为民主党派的干部不属于党的干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只是民主党派的工作,与自己无关。这些认识上的偏差,对民主党派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影响和制约着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从民主党派方面看,部分民主党派领导干部对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长期性、战略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充分,未能积极主动地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个别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认为后备干部建设是党派上级组织或是组织部门、统战部门需要考虑的事情,仅满足于配合上级组织、统战部门、组织部门等开展干部选拔、推荐等工作,缺乏对本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长期规划。以X区为例,

各民主党派区委几乎都曾在区委会讨论过后备干部建设问题,但仅有民建在区委工作条例中对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具体规划。

从社会大众方面看,一些条件优秀的党外人士对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各民主党派的情况缺乏深入了解,对加入民主党派组织心有顾虑,影响了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和后备干部选拔的人才基础。

(二)体制机制不健全

一方面,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导致民主党派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管理、使用等随意性较大、实效性不强。另一方面,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也存在制度难以衔接的“壁垒”,加大了提升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难度。

第一,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制度“短缺”。关于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在《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等文件有相应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于民主党派后备干部使用的相关规定,诸如“原则上要有”、“有一定数量”等比较模糊的表述,不具有刚性约束力和可操作性,容易造成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导干部对相关规定的认识、理解不尽一致,落实规定的力度和效果也存在差别。

第二,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面临一些难以突破的制度“壁垒”。民主党派干部以企事业单位居多,而目前在干部的使用上,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转化为公务员系统干部仍存在制度“壁垒”。因此,尽管一些党派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不少,但无法成功向外输送为行政干部,从而导致不少民主党派的后备干部“备而不用”。

另外,民主党派的后备干部一般需要同时具备专业性、代表性,任职岗位要与其专业、党派界别和个人能力有一定的适配性,导致各个民主党派后备干部能够适配的岗位较为有限。以 X 区各

民主党派区委主委的人选为例,各民主党派区委主委候选人一般需要历经正处级岗位,并具备党派界别的代表性。实际上,X 区内符合各民主党派特点的正处级岗位并不多,如适合民盟、民进的只有教育局长、社区学院院长等有限的五个正处级岗位,适合农工党、九三学社的只有卫生系统的三个岗位。而这些岗位,同样适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因此,如果不尽早规划、合理布局,换届时各民主党派主委容易出现党派内无合适候选人的现象。

(三)实际举措有短板

从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由于缺乏系统规划、统筹协调、督促检查,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过程的前期、中期、后期都存在相应的短板。

第一,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缺乏系统规划。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建设,不仅要考虑当前的需要,更要着眼长远,考虑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内党派自身发展和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需要。但目前来看,党委有关部门以及各民主党派自身都缺乏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中长期系统规划,使得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往往缺乏前瞻性、系统性。

第二,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缺乏统筹协调。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往往涉及党的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各民主党派以及后备干部所在工作单位等多个组织,这些组织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中的沟通协调、职能分工等尚缺乏清晰规定、有力统筹。这样一方面容易导致各个单位自行其是,民主党派、统战部门、组织部门各自掌握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人才库、后备干部的培养目标存在差别,影响后备干部培养的适配性;另一方面,也导致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责任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加大了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推进难度。

第三,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缺乏监督检查。按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规定,“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党外代表人

士”，“督促检查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把统一战线工作作为对党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内容”，是各级党委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职责之一。^②而有些单位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一些民主党派也未将后备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民主党派各级领导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导致一些党派领导干部重视程度不够。

三、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建议

要有效破解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充分体现党派特色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需要从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领导机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三个方面着手完善。

（一）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领导机制

要完善和加强党委对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统一领导，形成在党委领导下，组织部门、统战部门、民主党派以及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紧密合作的工作机制，落实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责任。

一是加强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的原则，将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纳入党委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议事日程，纳入党的干部人才工作的总体框架进行规划和部署，支持民主党派制定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定期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将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纳入党政工作目标责任考评体系，明确党委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落实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领导责任制。

二是统筹协调。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做好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不同组织之间的沟通协调，形成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民主党派组织分工合理、职责清晰、配合紧密的体制机制。健全党委组织部、统战部“两部”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共同制定规划、共同

物色选拔、共同培养教育、共同考察人选、共同研究使用、共同督促检查的“六个共同”运行机制。

三是宣传引导。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等要把统一战线和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作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的必修课程，加强对统一战线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宣传力度。

（二）优化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运行机制

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要逐步建立健全一套发现选拔、培养锻炼、管理考核、推荐使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的良好机制。

1. 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选拔机制

各民主党派要将组织发展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深度结合，按照“三个为主”、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吸纳优秀人才，保证党派后备干部数量充足，保持年龄梯队结构。要以各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的后备干部为选拔重点，若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中，近期能进班子的后备干部比例较少的，民主党派要在组织部门、统战部门的帮助下，尽早物色、选拔和培养优秀干部。

2. 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培养机制

适应民主党派干部成长规律，由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协同合作，对后备干部分层分类，进行系统、持续、有针对性的培养，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要结合实际对后备干部，实行党派内部安排、政治安排、实职安排、正职安排、社会安排等不同方向的分类培养、分类管理。由组织部门、统战部门牵头协调，针对民主党派后备干部的“短板”，为其提供更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的机会。

3. 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动态管理机制

要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基本情况变动报告制度，及时掌握后备干部的各类信息及其变化情况，把群众认可度高、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符合年龄要求的党派成员纳入后备干部人才库，并根据后备干部个人情况变化适时予以调整，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动态管理体系。

4. 建立和完善民主党派后备干部推荐使用机制

在党委领导下,进一步明确民主党派干部使用规定,明确要求凡是民主党派干部的提拔任用须优先考虑已经纳入后备干部队伍的人员,确实无法在后备干部队伍中选拔任用的,需说明情况并存档备查。要有计划地适当增加民主党派干部的领导职数,努力创造条件使优秀民主党派干部能够更多地担任实职、正职领导职务。对原有配备民主党派行政副职的单位,因党派干部退休或调离等原因出现职位空缺时,原则上应安排民主党派干部,达不到配备要求的,应留出空额适时增补民主党派干部。在党外人士比较集中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应保留适量职位用于安排民主党派干部,从而总体上保证拥有一支数量稳定的民主党派基层干部队伍。

(三)健全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保障机制

加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要在党委领导下,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健全配套制度安排,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一是加强各民主党派的专职干部队伍建设。应发挥党建的示范引领作用,保障民主党派从事后

备干部队伍建设,有专人负责,有相应的编制和经费保障。加大对专职干部的选拔任用力度,将年轻的党派专职干部纳入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予以重点培养。

二是加大政策落实的监督问责力度。将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情况作为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等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对违反规定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给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造成不利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通过严肃问责,推动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统战部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更加重视和支持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层层落实主体责任,从而为民主党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立“新”除“弊”:习近平纵论新型政党制度[EB/OL].(2018-03-0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05/c_1122491671.htm.
- [2]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EB/OL].(2015-09-2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2/c_1116645297_2.htm.

责任编辑:宋好

江苏民营经济 70 年发展经验启示

江苏省工商联课题组

摘要: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贯彻党中央的决策精神,统一部署,因地制宜,积极有效地发展民营经济,江苏经济和民营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收获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本文主要从根本保障、发展前提、发展动力、成长途径、相对优势等十个视角揭示分析了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以期对壮大民营经济、助推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营经济;贡献;党的领导;群众实践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43-08

新中国建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1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江苏省人民及民营企业家人同心同德、创新创业、胼手胝足、拚搏奋斗,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为富民强国、民族复兴作出了江苏贡献。

改革开放 41 年来,江苏民营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总量的微弱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鼎足而立”,再到超过一半成为“半壁江山”,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江苏民营经济已成为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创业创新的主体力量、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作出了“5566778899”的贡献——创造全省 55% 以上的 GDP、超过 5 成以上规模工业产值,六成的税收、接近六成的 GDP 增长贡献率,超过七成的全社会投资、超过七成的企业研发投入,超过八成的对外投资、八成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和九成高新技术产值、九成以上的国内发明专利。2018 年,江苏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 5 万亿,达 51483 亿元, GDP 占比 55.6%。2019 年上半年,江苏经济总量为 48.583 万亿元,增幅 6.5%,私营工业增幅 9.8%,民营经济创造了全省 55% 以上的经济总量。

江苏民营经济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发展壮大的,坚定不

收稿日期:2019-09-16

课题组简介:课题组长:许仲梓,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工商联主席;顾万峰,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课题组成员:丁荣余,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京,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周洁,省工商联副主席。李晓林,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桂德祥,省工商联一级巡视员;胡冬陵,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陆静林,省工商联二级巡视员;熊杰,省工商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课题研究报告撰稿人:吴跃农,省工商联一级调研员、省民营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移地发展民营经济是党和国家的坚强意志，是民心所向，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江苏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精神，按照统一部署、结合江苏实际，积极有效地发展民营经济，江苏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收获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主要包括 10 个方面。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江苏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

江苏民营经济 70 年发展历程最突出的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党领导经济工作具有应对形势变化的预判能力和适应能力，能够根据时与势的不同而灵活调整政策，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 41 年来，党中央把方向、定政策、促改革，江苏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执行、步调一致，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全面加强民营企业党的建设，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制度支撑和政治保障，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促进“两个健康”摆到重大经济问题和重大政治问题的战略高度，反复重申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专门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发表重要讲话，以“亲”“清”关系内涵定位新型政商关系，以“内在要素”、“都是自己人”定位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亲自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多次考察调研民营企业，引领民营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委认真传达、落实，出台相应政策举措，将广大民营企业家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江苏广大民营企业家普遍认为，民营经济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的，党的领导就是土壤、环境和空气，须臾不可或缺，“听党话，跟党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前提，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唯有此，一个个曾经饭都吃不饱的农村孩子、就业都成问题的城市普通青年才能成

长为民营企业家，有幸成为了这个时代巨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得益者。

二、改革开放“顶层设计”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和红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1949 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今后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总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标示了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和艰辛探索。1956 年，中共八大确定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1958 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江苏民营经济及原工商业者纳入、融入江苏建设力量，成为公有制和国家公务人员的组成来源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指出，“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始终与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41 年来，江苏民营经济起步于个体经济，发展壮大于私营经济，经过前二十年的发展能量积蓄，形成了近二十多年来全面高速发展的良好局面。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到农村承包“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最早“杀出一条血路”兴办深圳珠海等四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启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贸易试验区、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军民融合发展等等，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就是江苏民营经济的最大机遇和红利，江苏民

营企业家就是要“当好自己人做好自己事”。

改革开放的根本是党中央着力抓好“顶层设计”，寻求国家制度、发展机制最大程度贴近人民心意。省委把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与全省经济社会实际相结合，制定符合江苏实际的举措，提出指导性意见，创造性认真贯彻落实执行。1997年、1999年、2000年、2004年、2010年及2014年，省委先后召开五次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还举行了全省学习浙江经验会议。省政府2017年至2019年先后召开两届“江苏发展大会”暨“全球苏商高层论坛”。在重要发展节点，省委省政府都举行或委托省委统战部、工商联举行民营企业座谈会，通过建立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领导、规划全省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鼓劲、坚定不移地引导支持全省民营经济大发展，形成了江苏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良好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稳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二，经济年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近十多年来，我省民营经济总量一直相当于排列全国第五位左右的省区经济总量，苏宁集团、沙钢集团、恒力集团等许多单个民营企业创造的经济总量“富可敌省”、“富可敌国”。

实践表明，没有祖国的日益强大，没有改革开放“大创业”背景，就不会有江苏民营企业的一个个“小创业”成果；没有改革开放后国家不断夯实、培育民营经济发展的土壤，就不会有江苏民营企业的开花结果。他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是水和鱼的关系，水大则鱼大，鱼多则水活，鱼水相依，相互激荡，共创美好，共展美景。

三、解放思想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

江苏民营经济伴随解放思想取得重大突破而发展壮大。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保护、引导民营经济融入社会主义制

度和建设。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首先是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对省委出台的发展民营经济政策措施正确理解，认真贯彻执行，不断解放、扬弃僵化的思想，不断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不断破除“左”的错误和“全盘西化”右的倾向，不断突破、摒弃陈滞落后的观念，不断深化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的认识，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创新成果，不断扫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改革开放41年来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的。七十年代末农村改革时个体经济的初始发展，八十年代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时私营经济借助苏北耿车模式以及苏南苏中前店后厂家庭经济的创新发展，九十年代初接轨浦东大开发、外向型经济大发展时民营经济获得“伴生”发展氛围，新世纪前后苏南乡镇企业改制民营化，形成原生型、次生型民营企业较快发展态势，2003年之后江苏“两个率先”战略地位的确立，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全省民营经济的全面高速发展、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确立江苏“强富美高”发展目标及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每一次发展的重大突破、重要进步，都是运用解放思想利器冲破种种陈旧思想和已有经验束缚，勇于改革发展的结果。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促进民营经济新发展，必须继续大力推动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不断破除思想僵化、固步自封的惰性。

四、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不竭力量

民营经济的基础在于汪洋大海的人民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勤劳勇敢的江苏人民是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壮大的脊梁。江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鼓励基层自发探索、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允许苏南苏中苏北根据自身历史

基因区域特色发展民营经济的差异化、多元化尝试,充分尊重和总结、推广基层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实践经验;充分尊重和总结、推广民营经济主体的创业创新实践经验。这既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民营经济发展动能的充分释放。

江苏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认识到实践上每一次新生事物的产生、突破和发展以及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人民群众“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实践和智慧。改革开放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步发端,向城乡经济领域快速扩展,江苏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对民营经济的定性、乡镇企业改制民营企业,“苏南模式”的何去何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引导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等。面对这些问题,江苏企业家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发展出各种民营经济模式。苏北人民创造了“耿车模式”,形成了乡、村、联户、户四个层次办企业的“四轮齐转”以及合作经济与个体私营经济并驾齐驱的“双轮并转”经验。苏中人民创造了庭院经济,实施前店后厂的个体家庭私营经济,有力地促进了苏中的崛起和加快了苏北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破土而出”还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次生型民营经济后来居上,无论是共享经济“遍地开花”,还是惠龙易通、运满满等物流公司等物联网企业提高供应链效率,无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江苏民营经济原生型和次生型的共同发力发展,推动了全省上下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认识,推动了全省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实践充分证明,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每每得到充分重视、尊重、提炼和发扬,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就推进一步,民营经济发展就跨越一大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前进一大步。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更广阔空间,前进路上会遇到以前没有过的艰难,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只要继续尊重和总结好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吸纳人民群众中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始终与人民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获得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

热情参与,就动力不竭、力量倍增,踏平崎岖成大道,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去的坎,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尤其是江苏在集体经济发达领先的情况下改制发展民营经济,是一个自我革命、艰辛探索、不断前行的过程。伴随民营经济发展全过程,有春风化雨的党的政策、省委决策的阳光催生,也有陈旧观念和极左杂音的雾霾阻扰,江苏民营经济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发展不退缩,很重要的一点是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方针政策 and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41年来,江苏原生型民营经济发展伴随着“雇工”、“剥削”、“原罪”、“姓社姓资”等争议,经历了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制发展、乡镇企业改制发展,直面了“国进民退”、“姓公姓私”、“江苏特别是苏南只适合乡镇企业发展”等问题的争论,这都给民营经济发展造成种种不利影响。每当民营经济遭到质疑、受到阻扰时,党中央都及时、旗帜鲜明地进行政策宣示,澄清错误思潮,稳定民营企业家的预期和信心,江苏省委坚持贯彻落实,实施出台具体措施,从对私营企业产生时“看一看、等一等”的政策,到南方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三个有利于标准”,到明确民营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再到平息“原罪论”纷争以及党的十五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明确阐述,都体现了党中央清醒而长远的政策导向。2018年,针对“新公私合营论”、“消灭私有制”及“民营经济离场论”等错误论调,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锤定音的论断。省委组织江苏民营企业企业家座谈学习,鲜明强调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明确宣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会变也不能变,彻底驱散了民营企业家中心的雾霾,给他们吃下了“定心丸”。实践充分证明,战略方针保持长期稳定,“两个毫不动摇”是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基本国策,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江苏民营企业的最大期盼，是江苏民营经济之船战胜任何逆流破浪前进的压舱石，也是全国、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无论内外部形势怎么改变，无论前进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全省上下和民营企业都要坚持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凝聚共识、攻坚克难的根本指针，全省上下和民营企业都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必须坚守遵循的党的长期战略方针。

六、正确处理所有制关系是促进江苏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首先，在经济所有制认识上，江苏省澄清了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越好，成分越纯越好的偏见。江苏吸取建国后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求成、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验教训，根据所有制结构情况，加快发展民营经济，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践表明，公有制经济比重降低，国有独资企业减少，股份合作制企业增多，现代企业制度下民营企业的增加，不仅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相反有利于国有资本由分散走向集中，扩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支配力，有利于国计民生和繁荣经济。其次，在两者关系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相容关系而不是排斥关系，是共赢关系而不是零和关系。民企国企在江苏制造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彼此依存、相互支援、不可分离。20世纪80年代，民营企业起步之初，在产供销、技术、人员等各方面与国有企业就有着密切联系，吸纳了国有企业的许多优势，江苏尤其在改革进程中较好地处理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关系、乡镇企业与乡镇企业改制发展的关系及中小国有企业的改制关系，为民营经济的改制发展廓清了道路。世纪之交，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引入民营资本，盘活搞活，民营经济入股参股或兼并地方国有大型制造企业，双方携手共进。

改革开放41年来，江苏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各自优势，广泛开展合作，实现互助互补，促进了“国民共进”。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市场主体来说，本来就没有规定只能“民进国退”，或者不能“国进民退”，只要有利于整合产业，只要有利于产业总体竞争力的增强，只要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谁进谁退都是可以的，谁整合谁也都是可以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在重要行业领域，先后选择三批次50家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试点。江苏大型民营制造企业沙钢集团入驻东北国有企业老基地发挥“混改”积极作用，创下了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活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人才技术优势、“混改”后东北国有钢铁企业迅速扭亏为赢的喜人业绩。江苏凤凰传媒集团是国有控股文化企业，通过资本介入并购北京的一家民营文化工作室，这个工作室群体7个月时间给凤凰带来了十几本单本书十几万册以上的成绩。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江苏民营企业更是与央企等进行工程配套和产业链、供应链对接，团结一致共进共赢迈开更大步伐，形成了国有企业实力壮大、民营企业活力迸发的良好局面。

7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证明，党在制定发展战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同时，始终牢牢地“抓大放小”，理直气壮地控制重化工业、军工产业、太空、能源、通信、文化意识形态相关产业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继续发挥政策拓展市场、投资促进消费的优势，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坚定不移地优先和优化国有企业发展。同时，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以此确保政治大局稳定和谐，确保经济发展快速有序，确保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真正实现，确保国家主权强有力维护，确保我国、我省在全球经济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江苏改革开放41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国企、民企都是民族企业，同根而生、血脉相连，根本利益高度一致，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既不能重回“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老路,更不能走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证明走不通的全面私有化邪路。

七、“双强驱动”是江苏民营经济后来居上、超越式发展的重要优势

“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驱动”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来之不易的经济建设宝贵经验,更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和中国文化的优势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领导力量和指挥者是党和政府,实行“以党领政”、“以党导经”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有计划、按比例地”推动经济发展,通过高积累,重点发展重工业,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赶英超美”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中国短时期内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因此,1956 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民营经济消化、融合进公有制中,以政府集中制订生产计划,在所有行业中都建立快速响应、有效执行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政府的强驱动作用是有效的。

改革开放后,尤其在江苏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阶段,“强政府”意外地与市场化主导走在一起、紧密结合,创造拓展市场和实现市场的有效性,“强政府”与“强市场”相互作用,产生了驱动经济发展的优势效应。2018 年、2019 年美国单边主义贸易壁垒高筑,江苏省政府强化引导和服务,持续加大市场开拓、政策支持、业态培育等,有效应对贸易摩擦,促进民营经济国际化发展、产业链结构不断优化和市场多元化趋势,有效激发了民营经济的“走出去”内生动力。实践证明,“强政府”和“强市场”是相互依存、合力协同关系,两者不可偏颇,缺一不可,“苏南模式”政府与市场的双强驱动模式,形成政府推动、科教引导、企业家主体性充分发挥和市场主导的“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合力紧握,能够强有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江苏“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一直全力以赴,政府“有形之手”强在规划引领上,强在政府服务上,强在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

上。江苏各级政府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追求完备的制度、高效的运作、科学的管理。江苏各级政府、特别是苏南各级政府规范运作水平、社会治理水平都较高,确定产业战略方向、制定产业扶持和吸引人才政策较精准,不仅有“店小二”的服务意识,更有当好“店小二”的高强本领,有丰富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的管理运营经验,江苏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上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强政府”优势。

江苏实践证明,“双强驱动”是适合中国国情和江苏省情的,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极为重要,两者不是排斥排异关系,而是互生共容关系,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必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达到最有效配置资源目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江苏省委提出要在厘清政府、市场边界和把握好“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前提下,沿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方向双向发力、汇成合力,打造“双强引擎”,让市场“无形的手”充分施展,又让政府“有形的手”收放自如。

八、优良营商环境是促进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各级政府全力营造优良营商环境是基本职责。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生存和发展的“水”和“空气”,放水才能养鱼,空气清新、负氧离子高才能健康呼吸。江苏各区域、各地民营经济发展有落差,还存在不均衡、不协调现象,这其中有各地工商历史基因、工业基础条件、资源禀赋等因素,但区域经济发展,比的就是能否促进民营经济内生动力蓬勃昂扬,能否促进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弘扬发挥,能否成为吸引人才和投资的高地。是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春风骀荡万商来归,还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失望惊心人去楼空,归根到底就是营商环境的优劣高下,“清”、“亲”新型政商关系是否到位。

从 1978 年到 2019 年,苏南民营经济尽管不是最早兴起的,但在创造 GDP、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上处在全省遥遥领先地位。究其原因,地方干部想作为敢作为善作为是重要原因。地方干部“不

等、不靠、不要”，积极优化创业兴业环境，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手段及具体做法到位熨贴。通过这些措施，江苏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使营商环境更为宽松、更为优越，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被充分涵养激活。

实践证明，政府是营商环境和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哪里市场化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相对滞后，哪里民营经济就不会得到充分发育，创业创新意识就淡薄，区域经济路径就缺乏、增长就乏力。一个地方市场化程度越高，民营经济就越活跃和发达，经济发展就越有活力。营商环境的优良必须是全方位的优良，是经过长期的、一任又一任干部的精心营造呵护的结果，是渗透在一个地方整体文化氛围中的，有着让客商来了就不想走、不愿意走的强烈“归属感”的，其产生的马太效应是不可估量的。苏州昆山之所以能够吸引德国企业趋之若鹜，成为德企投资高地并成就周边地区强大的民营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形成产业闭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益于“昆山之路”开放包容亲商安商的营商环境，得益于昆山精神中一以贯之的“双创”精神，得益于昆山高于国际标准打造优秀营商环境。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省上下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以改革创新的办法，以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对症下药革除当下的陋习顽疾，进一步优化区域和各地营商环境，推动江苏民营经济走向更高质量、更加均衡的发展。

九、以“厚德、崇文、实业、创新”为内核的苏商精神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明清时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到近代坚守实业经济、发展商业经济；从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社队企业，到改革开放后“首吃螃蟹”创建乡镇企业，江苏自古以来就不乏融入市场、闯荡市场的基因，是蕴育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的热土。

1979年春邓小平北京“五老火锅宴”，标示着要把企业家请回来，把企业家精神请回来。改革开放初，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就得到了重视和弘扬，江苏原工商业者在省工商联的领导下，积

极发挥自身海内外联系广泛、富有兴企办厂经验的特点，通过兴办经济咨询服务机构和智力支边等活动，引领原工商业者和全省工商联系统为“四化”建设献智出力。改革开放41年来，江苏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弘扬，大致形成了五代民营企业群体。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的84年私营经济萌生后发展成长的一代；二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92原生型一代；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乡镇企业次生型一代；四是世纪之交的互联网一代；五是十八大以来企业家传承的创二代、新生代。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为推动我省经济繁荣、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民营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推陈出新、代际接力，他们的成功为改革开放事业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们的失败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有益镜鉴。他们不等不靠、不满足于既往成绩，不忧不惧、勇于脱胎换骨，成为时代迫切需要的企业家。他们弘扬“厚德、崇文、实业、创新”的新苏商精神，使命感和角色意识不断增强，事业目标更加远大，坚持不懈、积极进取成为企业家群体的精神风尚。江苏民营企业战略决策能力显著提升，决策模式明显优化，采取主动探索型战略的企业家比重不断上升。江苏民营企业家敏锐捕捉变化中的需求和机遇，在转型期提前落子布局、抢占先机，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积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江苏企业家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完成了从基于实践经验管理的经营者向基于现代系统管理知识的企业家的飞跃。江苏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企业家在选择做企业目的时，自我实现的需要比重不断下降，而回报他人和社会的综合比重不断上升，关注生态环境、重视员工发展、参与社会公益成为普遍风尚。江苏民营企业精神内涵不断深化、丰富，实现了从冒险开拓、吃苦耐劳到持续创新、精益求精的演进。诚信、造福社会等更多迈向美好生活所必需的现代商业文明，成为优秀企业家的价值共识和不懈追求。

江苏民营企业以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锲而

不舍的奋斗精神,组织带领千百万劳动者奋发努力、艰苦创业、不断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做大了国民经济的蛋糕;不仅创造了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也亲身实践着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成为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的构建者、实践者和弘扬者。

优秀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强调爱国情怀,实业担当,科教为基,创新为魂——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创新和抢拚市场速度是企业家的生命特征,创新是苏商企业发展的核心动能,企业家创新引领行业、产业的新生产方式,创新社会生活方式变革,民营企业家是风险的积极承担者。通过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激励广大苏商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家乡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强有力精神凝聚支撑,成为源源不竭的旺盛内生动力。

实践充分证明,江苏经济发展能够创造突出业绩,民营企业功不可没。走进新时代,我们要进一步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新时期苏商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让亲商、安商、富商观念在全省上下蔚然成风,让广大民营企业安心、专心、放心、舒心谋发展,让企业家精神、苏商精神引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统一战线是促进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宝,工商联“两个健康”工作主题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导航仪”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1年来,全省工商联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和省政协组成单位,弘扬“听、跟、走”的光荣传统,发挥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大问题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主渠道作用,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推荐工作。一是规范民营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落实好“三强一好”的用人标准,进一步提高队伍素质,优化人员结构,健全选拔机制,细化综合评价考察程序,增强政治责任感和风险防控意识;二是协助做好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特别是以商会党建为抓手,扩大统战工作在非公经济领域的覆盖面;三是积极寻找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的突破口,积极构建江苏商会发展生态圈,加强商会规范化建设,沟通协调商会在登记

注册和承接政府职能方面面对的问题。

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密切联系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和行业组织、异地商会、基层商会,表彰宣传他们中的先进典型。积极推动光彩事业,评选表彰“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出台和实施“四好商会”标准,推动商协会的改革,推进省政府首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文件的制定出台。

积极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常态化实施民营经济政策落实情况第三方评估。一是积极改善营商环境,用好第三方评估,根据新形势确定建言献策、联系服务的重点,深化与公检法部门合作,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二是健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体系,建立1+N与政府沟通协作机制,搞活中小企业委员会、强化工商联界别省政协委员活动,建立民营企业信用体系、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产学研对接机制等平台和抓手。三是在与多部门建立工作会商机制的基础上,形成“1+N”工作合作机制。“1”指工商联,“N”是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通过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加强多部门点对点沟通,传递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形成符合民营企业发展特点的问题解决方案,充分释放有关部门的政策红利,放大部门合作的叠加优化效应,合力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政务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工商联在促进“两个健康”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现实的工作基础,有为有位,只要积极工作,就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工商联“两个健康”工作主题是江苏民营经济发展的“导航仪”,是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护身符”。走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队伍状况日新月异,促进“两个健康”面临许多新课题新任务,民营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工商联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工作效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发挥,使工商联成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真正成为民营企业家众望所归的家。

责任编辑:蒋建忠

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探讨

——基于广西贺州的调查

龚 晨

摘 要: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价值意蕴,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维度看,在于非公经济统战工作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看,在于运用统一战线方式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执政价值。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内在要求。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要革新理念,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推进“两个健康”工作;扭住重点,提升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质量;创新机制,加强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保障机制建设。

关键词:统一战线;非公经济;两个健康

中图分类号:F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6-00051-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1]与此同时,“两个毫不动摇”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方针、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明确下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2]。在2018年11月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三个没有变”,要求从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等六个方面,大力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壮大。这充分表明,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党外人士统战工作的新发展,不仅构成了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深刻揭示了统一战线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广泛的内在联系。统一战线的本质属性要求,必须创新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发展,在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中发挥出应然作用。实践证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上彰显出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如何拓展非公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凝聚起非公人

收稿日期:2019-10-18

作者简介:龚晨,中共贺州市委党校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党建、公共管理研究。

士的积极力量,实现“两个健康”,确保非公经济人士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完成好党的执政使命,成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一项亟待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基于此,本文结合贺州市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实践做法,探讨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价值意义,探索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机制制度安排和方式方法,以期深入把握新时代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律。

一、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贺州市统战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两个健康”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敢于担当、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构建“大统战”工作机制体系,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全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使“两个健康”成为推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重要引擎,发挥了非公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贺州的实践做法如下。

(一)构建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推进机制

注重顶层设计、高位统筹,是贺州推进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重大举措。一方面,在坚持“三个纳入”制度基础上,即纳入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会上学习、纳入年度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要点、纳入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围绕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推进简政放权、强化财税政策支持、加强金融创新服务、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方面,出台《贺州市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等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为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提供工作机制保障。另一方面,构建厅级联系非公企业常态化机制,成立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个转企、小升规(小上限)、规改股、股上市”工作领导小组,充实市非公有制经

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建立市、县(区)两级非公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加强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领导,制定厅级领导联系服务非公有制经济强优企业有关工作规定,确定县市四家班子成员、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系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强化协调沟通,统筹整合资源,做到各司其职、互通有无、协同推进,形成“大统战”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合力,着力增强推进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耦合效应、整体效应与叠加效应。

(二)完善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平台机制

新时代开展好统战服务工作,发挥非公经济人士的作用,丰富多样、高效运作的工作平台必不可少。贺州通过搭建四大平台,延伸统战工作手臂。一是非公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平台。紧扣“建设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工作主线,创新“双飞地”经济模式,开展“飞地企业”“飞地市场”合作,发挥非公企业、产业园区的东融引领作用。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民营企业与国有公司平台合作。目前市内7大集团公司已与民营企业组建(设立)合资合作公司15家。二是非公经济示范创建活动平台。通过实施集聚发展工程、品牌创建工程、质量提升工程、技术支撑工程、生态安全工程等“五大工程”,有序开展民营经济示范市、示范县(市)、示范乡镇、示范园区创建活动,大力推动“四升”,推动“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提质增效。三是非公经济科技创新拓展平台。加大非公经济科技创新力度,设立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不断拓展延伸非公经济科技创新平台,深化与知名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推动技术研发和产学研融合,培育强优民企。强化非公企业转型升级指导,引导非公企业积极开展技改投入和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四是非公经济人士队伍建设平台。成立非公经济商学院,将非公企业专项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采取解剖一个典型案例、讲授一套实操做法、解决一个本地企业的实际问题即“三个一”教学法,提升培训实效;采用非公经济人士“走

出去”培训+“请进来”培训+借势借力培训的多元一体培训模式,努力提升企业家的思想政治素养、综合管理素质。并借此平台,开展政银企对接会,实施周末会商制度,推动非公经济与发达地区在制度、机制、文化无缝对接。

(三)优化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支持保障机制

面对非公经济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三扇门”、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等问题,贺州通过强化五大支撑保障,为非公经济“两个健康”注入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一是金融服务保障。大力推进税务改革,压实减税降费工作落实,成功举办银企对接洽谈会暨签约会,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据调查反映,仅2019年上半年就有47家企业与金融机构签约,融资3.8亿元,有效缓解了非公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8654户纳税人享受四项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减免金额392.15万元。二是法治环境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工商联与检察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在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中建立检察官联络室,在园区设立“民营企业法治驿站”,与企业零距离、面对面接触提供“定制”法律服务,依法着力推进“清欠”工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全力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三是政务服务保障。围绕降低非公经济的时间成本、要素成本,深入开展“优化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减证便民”活动,优化政务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店小二精神”做好“保姆式”服务,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办理“最多跑一次”和“一次不用跑”覆盖率达90%。四是技术运用保障。建构在线网上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互联网+”大数据体系,创新建立线上反映线下协同办理机制,建立线上反映问题受理制度,推行“非公e家亲+”模式,线上线下合力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线上线下结合对接破解非公企业中的项目审批、用地等方面难题,倾听非公人士心声。五是舆论支持保障。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宣传媒体,加大非公经济发展政策宣传,开展非公杰出代表人物评选活动,加强民营企业企业家创新创业典型报道,常态化传播非公经

济正能量、弘扬企业家精神,营造全社会关心民营企业成长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新时代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价值意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3]开展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新的历史方位条件下出发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做好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维度看,在于非公经济统战工作在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看,在于运用统一战线方式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执政价值。

(一)时代意义: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基础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犹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4]“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5]事实证明,新时代条件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发展壮大非公经济,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6]需要坚持好、实施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是党中央的一贯方针,这一点丝毫不会动摇”,^[7]“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8]党

的十八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到 2018 年,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为国民经济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 90% 以上的企业数量”。^[9]基于此,从时代发展的维度看,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就是坚守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方针政策,就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二)现实意义: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是推动社会经济跨越发展的内在需要

如前所述,贺州通过建构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推进机制、平台机制、保障机制,有力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据调查,2018 年,贺州非公经济税收 37.43 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达 76.6%,同比增收 7.4 亿元,增长 24.6%。全市规模以上非公工业企业 189 家,占全市比重 85.9%,其中规模以上非公工业总产值 75.8 亿元,同比增长 40.9%。从这点上看,应充分调动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在内的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足用好党和国家关于工业高质量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各项政策措施,使“两个健康”真正成为地方经济社会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引擎,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民营企业政策获得感不强,各部门沟通合作不够,有限的资源被分散使用,不能形成链条完整的扶持体系,对企业支持力度有限;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六大政策举措力度不够;全程电子化政务服务平台推行缓慢,用地、用电、用工等成本高,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突出,等等。这些严重束缚着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基于此,从现实发

展的维度看,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就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就是推动社会经济跨越发展的内在需要。

(三)执政意义: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是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内在要求

“党的阶级基础除了要有一定数量的队伍之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执政党对阶级基础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上”。^[10]非公经济人士作为我们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现实‘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11]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目的,就要注重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尤其是,在我们党执政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非公经济人士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党和政府信任、对企业发展信心以及对社会信誉还举棋不定、摇摆不稳等突出问题,这迫切需要我们坚持统战对象延伸到哪里就把统战工作覆盖到哪里,把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作为共同的政治责任。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本质是做好群众工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是我们党对自己阶级基础的一部分特殊群众的工作,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深入而持续地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开辟了新空间,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从长期执政的维度看,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就是引导和帮助广大非公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重要途径,是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内在要求。

三、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路径选择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是

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12]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越能得到充分发挥,团结社会各界的人越多,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就会越强大,我们党的事业就越能更好地向前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两个健康”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重道远。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更大包容心态,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制度机制和方式方法,夯实统一战线凝聚人心的民意基础和汇聚力量的社会基础,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汇聚起磅礴伟力。

(一)革新理念,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推进“两个健康”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深入观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在规律科学探索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出了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党的系列重大会议,多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提出了一系列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论断、新思想。如,明确提出了“两个都是”、^[13]“内在要素”等新理念,明确肯定了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科学回答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最紧要、最现实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新时代促进“两个健康”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是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创新的根本遵循。然而,就促进非公经济“两个健康”的客观情况来看,“当前民企面

临的问题确实是一系列主客观、内外部因素叠加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深刻剖析可以发现,思想不够解放、政策难以落地、法治缺失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15]对此,要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放思想是首要的”,^[16]而不能简简单单地依赖过去的老路子、老办法、老经验,而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索新思路,实践新方法,在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工作重心上进行彻底的转变,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创造性地开展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

(二)扭住重点,提升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质量

质量是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生命。只有把服务工作质量提升摆在突出位置上,让非公企业、非公人士,有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做到服务工作的应然与必然的统一。要坚持质量至上原则,扭住服务内容重点,把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顺应非公经济发展特征趋势,切实增强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成效。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短板和弱项,增强政策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大多处在政策执行层面,是政策执行落实不到位形成的,必须下决心解决”。^[17]要针对公平竞争环境构建难、市场限制破除难,准入障碍多、“三门”困境等问题,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落地、培育强优非公企业和知名品牌、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方面上下功夫见实效,提高非公经济政策执行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二是把握非公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找准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与统战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决不能盲目行事,而应结合他们的内在需求,把握好服务内容重点,从统战工作的职能优势出发,有选择性地切入,提高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效率、效能。应着力在加强非公经济政策法规宣传、思想政治引领、专业知识素质培养能力提升、参政议政、企业家人身财产安

全保护、正向激励关心关爱等方面上下功夫见实效,消弭企业顾虑,提振发展信心。三是顺应信息时代发展要求,提高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信息化水平。树立互联网思维,运用互联网手段改进服务工作,强化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现代信息技术运用,搭建对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数字化、网格化、动态化和人性化的服务与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网络统战建言献策平台、交互沟通平台,打造非公经济人士参政“阳光”平台,畅通非公经济人士利益表达网络渠道,着力提升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的精准化和精细化水平,切实做到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协同高效。

(三)创新机制,加强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保障机制建设

制度是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如何加强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保障机制建设,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统战服务工作所要着力解决的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工作、国家治理、两新组织发展、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等方方面面的实践探索表明,建构起科学管用、结构合理、高效运作、坚强有力的保障支撑机制体系,是做好统一战线服务工作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18]具体到发展壮大民营经济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创新统一战线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不仅需要思想创新、模式创新、组织创新、活动创新、平台创新,更需要制度创新,加强保障机制建设。为此,一是要加强调研机制建设。对标促进“两个健康”工作走在前面的地区,对标与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合理合法需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研判非公经济问题发展态势,剖析制约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根源,研究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径,为服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工作提供前瞻性的理论支持。二

是要严格执行责任落实机制。建立层层抓落实的台账机制,聚焦培育强优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重点任务,强化责任分工、监督检查、考核通报等工作制度执行,做到该约谈的约谈,该通报的通报、该问责的问责。三是要健全人才成长培育机制。优化非公经济人士成长管理环境,广搭联谊交友平台,全面开展党政领导干部与非公经济人士联谊交友活动,坚持以点带面,强化典型宣传和示范引领,拓展非公经济人士议政参政平台、政治实践锻炼平台,建立健全面向非公经济领域的荣誉授予或表彰体系、非公经济人士成长档案登记机制、非公经济人士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增大非公经济人士发展机会概率,使更多的非公经济人士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脱颖而出,提高对非公经济人士的教育引导力、政治引领力,全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进而为社会经济发展集聚强大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19(1).
- [2]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人民日报,2015-05-21(1).
- [4][5][7][8][11][12]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80、481、479、481、481、481-482页.
- [6][18]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光明日报,2019-09-25(1).
- [9]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1-02(2).
- [10] 姚海同,张雄.浦东新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创新与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0(5).
- [13][14][16]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 [15] 隗斌贤:新时代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治理研究,2019(2).
- [17]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03-09(2).

责任编辑:蒋建忠

改革开放 40 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研究

吴似真

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 40 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为研究个案,对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探求佛教与时代的统整、融合和适应之道,促使佛教僧团在管理制度方面能应时代机宜作出调整,从而促进整个佛教僧团在管理上的现代转型,最终实现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力求为当前中国宗教治理提供些许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普陀山;佛教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57-07

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宗教工作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的宗教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一方面,由于我国宗教获得快速恢复和长足发展,宗教信众和宗教场所数量增加,宗教影响力日益扩大,逐渐成长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佛教具有天然的世界性和国际性,是众多海外华人的共同信仰,也是联结华人华侨的重要纽带,更已成为体现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日益面临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宗教对当下乡村及都市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随着全球化,宗教个人主义的兴起,我国都市也或将面临一场所谓的宗教个体化“灵性革命”。另外,“非马克思主义化”、“去意识形态化”、亲有神论等思潮沉渣泛起,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要求宗教治理水平提升到新高度。

浙江普陀山是享誉海内外的“观音道场”、“海天佛国”,它既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丰富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海岛风景,还有着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佛教管理思想和制度。以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为研究个案,对于加强把握汉传佛教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对于提高汉传佛教教育、管理和服务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可为如今的中国宗教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普陀山佛教在党的方针政策引领下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积极建设爱国宗教团体,恢复宗教活动场所等等,重新得到振兴,并逐渐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办法,走在全国佛教界的前列。普陀山佛教发展进入“黄金期”,中国特色

收稿日期:2019-11-05

作者简介:吴似真(1980-),女,浙江舟山人,舟山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科研处副处长、《中共舟山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编辑。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8 年度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调研点委托课题《改革开放 40 年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工作实践研究》(课题编号:WT2018017)优秀成果。

宗教治理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党的指导方针树立治理政策支柱

1977年,宗教工作领域同其他工作一样开始“拨乱反正”。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部宪法,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全面落实宗教政策序幕由此展开。1993年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宗教政策的三句话,即“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01年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将“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与1993年的三句话并列,形成了宗教工作的四句话。2002年十六大报告完整地表述了四句话,自此形成了宗教政策的四句话。2003年,在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中将这四句话中的第三句与第四句次序做了调整,并确立为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这标志着中国特色宗教治理走向成熟。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公开谈到中国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2007年,“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被写入党章。201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更加准确全面阐释和丰富了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内在逻辑和辩证关系,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体系和方针政策,逐渐走出一条正确处理我国宗教问题的成功之路,这些方针政策为普陀山佛教的恢复与发展树起政策支柱。

(二)加强宗教团体建设引导正向共识

支持宗教团体、爱国组织正常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地宗教团体和爱国组织开始陆续恢复活动。1980年,恢复普陀山佛教协会,妙善法师出任会长,统一管理各寺庙佛事、经济、组织、修建、人事等。9月16日,中共舟山地委发文落实宗教政策,为“文化大革命”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僧尼平反,发还被查抄财物。1981年,根据国务院《关于

汉族地区佛道教寺庙管理办法》,将政府已经批准开放的寺院庵堂,归还佛教协会整修和管理,还未开放寺院,暂交有关部门管理与保护。佛协贯彻“以庙养庙”、“以庙养僧”政策,筹集资金整修寺庵。1982年,普陀山佛教活动渐趋正规,舟山行署发布《关于加强普陀山风景名胜保护管理的通告》,严禁任意辟地建房,整顿乱占土地现象。1983年,普陀山上18处寺庙庵院和名胜古迹正式对外开放,普陀山进入全面复兴时期,一时国内外进香游客骤增。至1992年底,普陀山上佛事活动恢复正常。

重视宗教教育与宗教界人才的培养。宗教教育和宗教界人才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1980年12月,中央统战部批转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关于恢复宗教学院的意见》,其中包括恢复中国佛学院,培养一批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和研究人员。党和政府在经费、场所及人员编制问题上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提升宗教界代表人士的影响力,强化他们的桥梁纽带作用。在舟山市政府指导下,普陀山佛协实行“三统一”和“三三制”管理,整合人力、财力和物力,为人才培养提供基础保障,并搭建起完整僧才上升通道,实现普陀山佛教全面转型升级。

进一步夯实共同思想和政治基础。宗教中国化,对党和政府开展宗教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2009年,舟山市委统战部、舟山市民宗局陆续出台《关于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舟山市市级爱国宗教团体及负责人综合评价工作实施意见(试行)》等,不断加强爱国宗教团体的自身建设,对各级爱国宗教团体的思想建设、人才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建立和完善了宗教界代表人士约谈制度,为宗教中国化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三)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操作遵循

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管理水平。1997年12月6日,浙江省率先通过《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走在全国前列。舟山市则针对县区行政执法力量

不足的现状,健全和完善了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责任制,市级和县区的民宗部门对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的开展情况实行联合行政执法检查,每年4次轮流召开联席会议,每次明确研讨内容,针对性部署工作。在确保县(区)级宗教工作部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同时,结合工作实际,采取“一员多岗”的办法,有效延伸了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在基层的触角,充分发挥了基层干部在民族宗教工作中的延伸作用和信息员、调处员的作用,对维护全市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搭建和完善宗教团体管理体系。在党和政府指导下,1982年4月,普陀山佛协集体讨论通过《普陀山寺院规章制度》。1992年,制定《普陀山寺庵制度》。各寺庵根据各自情况,相继健全各项规制,如《共住规约》、《财务管理制度》、《消防安全制度》、《殿堂香灯制度》、《卫生管理制度》、《职工管理制度》、《客房服务员制度》、《门岗管理制度》、《食堂餐厅卫生管理制度》、《法物流通处管理制度》、《僧伽培训班制度》、《念佛堂制度》等10余项。1995年3月,增订6项规制,分别是《文书、打印与保密制度》、《接待来访与陪客制度》、《学习与会议制度》、《费用与开支制度》、《值班与考勤制度》。自2010年起,舟山市统战部(市民宗局)遵循佛教传统规制,致力于指导普陀山佛教协会进行人、财、物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先后制定了《普陀山佛教协会章程》、《普陀山佛教协会寺院管理制度》、《普陀山佛教协会关于寺院(单位)财务支出管理的暂行规定》等,基本完成了普陀山佛教协会管理制度体系建设。2014年,开展“制度落实年”活动,通过举办各类制度学习班,帮助全山僧众学习各项规章制度,确保全山运作如法如律、规范有序。

(四)全山管理制度基本完成体系建设

引入行政管理方式,加强班子和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为将爱国宗教团体打造成为引领宗教中国化的重要阵地,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宗教

团体的领导班子建设,将一大批爱国爱教、年富力强的宗教界代表人士安排到领导岗位,鼓励和支持他们探索工作新思路和创新工作方式,加强集体领导、民主决策、规范管理,杜绝一把手个人独断专行而导致的寺院佛教商业化倾向。佛协层面,建立会长会议、常务理事会议制度,并在理事会上对全体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进行思想政治、道风教风、履职尽责和能力素质等方面的民主测评,将测评结果及时反馈,还建立对佛协领导班子成员约谈制度;全山寺院层面,设立民主管理小组。在普陀山佛教协会全面创新教职人员管理制度,坚持以“主导引领主体”、以“法制完善教制”、以“继承推动创新”、以“规范促进长效”。在普陀山佛教协会换届、届中和寺院负责人考察中引入综合评价体系,用制度培育现代僧团。

全山管理遵循“三统一”原则。改革开放以后,72岁德高望重的妙善法师重返普陀山,在政府和舟山市普陀山管理局的支持下,带领普陀山僧众恢复和建立了普陀山佛教协会,修复寺院,创办普陀山佛教颐养堂、普陀山佛学院、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及创办学术年刊等等。妙善法师创立的以“人事统一调配、经济统一核算、修建统一规划”为主要内容的“三统一”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一个法人(佛协)、二级(佛协、寺院)管理、统分结合”的僧团内部管理体制。“三统一”原则进一步完善了普陀山佛教协会的领导体制,几十年来对普陀山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深获各级政府和各地佛教僧团好评。

探索发展“三三制”管理新模式。2016年,在“三统一”管理制度基础上,引导普陀山佛教协会创新“三三制”僧团发展模式。其管理思路与僧团建设方向,即全山安排一部分僧人用于日常管理、服务大众,一部分僧人用来落实传统的经忏佛事等法务活动,一部分僧人则潜心闭关、参禅、阅藏、念佛等进行深化与发展,形成管理服务、弘法利生、信仰修持三大格局。在“三三制”管理模式中,信仰修持沿袭了传统修学模式,为优秀僧才奠定基础;弘法利生乃僧人修学的实践延伸,也为满足

信众需求;管理服务则是鼓励僧人建设管理寺院,维护道场清净庄严。“三统一”与“三三制”在协助普陀山管委会做好老庵堂腾退和移交工作,推动普陀山从香火兴寺向修持兴教、文化兴教转型,普陀山佛教协会僧团管理、教职人员管理、财务制度管理以及倡导文明敬香等方面均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样板意义。

齐心发力、合理规划,加快全山建设。“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普陀山遭遇严重破坏,百废待兴,寺院、景点均待修复,基础设施条件极差,国家为加快普陀山建设,1979年4月,成立舟山市普陀山管理局,1979年国家拨款,开始修建寺庵。1980年3月,普陀山佛教协会恢复,之后,管理局与佛协共同致力于浩大繁复的寺庵修复、佛像重塑工程以及普陀山的基础设施建设,1982年,普陀山被列为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普陀山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时期。1979-2018年,国家和地方兴建道路、码头、水电通信、文化娱乐、宾馆饭店等基础和服务设施等,为普陀山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如今,普陀山上共有宗教活动场所47处,其中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大乘庵等40余处古刹名庵兴复成为国内丛林模范,常住僧尼约1100名,职工近1000名,年接待游客700万人次左右,重现佛国辉煌。

(五)发挥宗教社会功能实现双向互动

提高僧团整体素质,实现弘法利生。僧团水平极大影响着佛教的未来发展,改革开放后,妙善法师致力于僧伽教育,1985年5月,为提高僧众文化水平,普陀山佛协受浙江省佛教协会委托,在佛顶山惠济寺开班“浙江省僧伽培训班”,学员是来自全省名山寺院执事僧及志愿求学僧众。经妙善法师的多方奔走,1988年2月,普陀山佛学院正式创建,面向全国招生。1990年,开办天台宗研究班,选择普陀山佛学院当中学业优良的预科班毕业学僧,继续培养深造。2003年,国家宗教局同意普陀山佛协以“中国佛学院教育学院”名义筹建新的佛学院,2011年,升格为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是我国汉语系高级佛教院校。

新时期佛教的复兴与转型,佛教居士与普通佛教信众是佛教发展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动因。改革开放以来,为推动普陀山成为世界佛教圣地、观音文化中心,在党和政府支持下,普陀山定期举办讲经说法活动,举办书画展,开设堂斋让信众体验佛教饮食文化礼仪,深入开展佛教文化研究,指导佛教博物馆编制印刷馆藏文物目录和高仿等工作,成立普陀山海潮音梵呗团,利用网站进行网络弘法和修行,等等。2015年初,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在全国率先开展居士教育。这些教育培训活动为中国佛教界输送了大量信仰纯正、学修兼优的高级僧才。

加强教风建设,维护纯正信仰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协会坚持以戒为师,以法为依,勤修三学,严格要求佛教教职人员“僧装、素食、独身”,引导僧众威仪端庄、洁身自律、持戒精严,具足僧格、圆满僧格、保持僧格,引导僧众遵纪守法,着力打造政治上可信、作风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领导班子,作风过硬、会风端正的好团体,是非明白、定力深厚、僧德高尚、学养丰沛的新时期僧人。

推行符合佛教教义教规的供养机制,去除商业化氛围也是保持僧团道风清净、信仰纯正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后,妙善法师就提出了“文明三支香”的文明礼佛理念。1995年,全山寺院的蜡烛亭被拆除。1996年,普陀山西方净苑开始推行“文明三支香”活动。2001年7月开始,全山各大寺院禁燃蜡烛和禁止燃点长度超过60厘米、直径超过1厘米的大规格香棒,在全国率先实行“文明敬香”举措。普陀山佛教协会加强制度建设压缩商业化操作空间,严格抵制商业机构介入,普陀山佛协所辖范围之内,除了为信众提供方便的法物流通处,无其他商业项目,没有出现承包上市的做法,也没有旅游机构。

搭建慈善平台,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多年来,普陀山佛协在市委统战部(民宗局)指导下,规范慈善公益经费预算管理,建立慈善公益项目申报制度,加强公益慈善经费使用监督与项目管理等,以“弘扬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发扬优良传统,践行

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宗旨,不断推进普陀山佛教公益慈善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佛协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每年安排2500万元善款用于开展扶贫济困、助学助残、医疗救助、五水共治、少数民族村等慈善公益事业。2011年,佛协捐资4.5亿元用于朱家尖大桥复线工程(观音大桥)建设,创下中国宗教界单笔捐款之最。目前正在建设的观音法界所有项目均由普陀山佛协出资,花费几十亿元,在其项目建设、运行管理上都体现了公益性。自2010年来,佛协累计投入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超6亿元,相继获“浙江慈善奖·机构奖”、浙江省“慈善工作奖”、“红十博爱功勋奖银奖”等荣誉,为普陀山赢得了极大的感召力和公信力。

(六)和谐共生,致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

弘扬“善”文化,增进国际友好交往。改革开放后,作为享誉世界的观音道场,普陀山每年吸引大量海内外信众前来敬拜朝圣,成为世界观音文化的中心,普陀山的国际交流迅速增长。妙善法师在任时期,每年都要组织本山法师到台湾、香港、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美国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宗教文化交流,还为保护、建设佛教名山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如今,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普济禅寺的现任方丈道慈法师,继续致力于推动佛教交流,弘扬观音文化。1994年至今,出访过日本、泰国、新加坡、意大利、罗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海外华人佛教徒的尊敬和爱戴。近年来,普陀山佛协更是加强与泰国、缅甸、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美国等国家佛教界的交流往来,这些活动不断牢固中外友好往来的“黄金纽带”。

打造交流平台,提升普陀山国际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致力开展与各省市重点寺院、佛学院和各大学院校以及国际佛教界的交流与合作,交流内容如深化寺院管理、学修实践、僧伽教育、服务社会等方面。国内方面,与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浙江海洋大学等高校进行合作,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普陀山教学科研实践基

地”,深化与台湾、香港、澳门佛教界的交流与合作,自2010年开始,普陀山佛教协会连续五年成功举办对台佛教交流活动,如“观音文化宝岛行”活动等,旨在加深连接两岸的佛缘民心,服务祖国统一。国外方面,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联系,通过举办禅修游、千人斋宴等活动,积极推动美国、澳大利亚等海外弘法及文化交流居士组织建设。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先后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日本大谷大学、斯里兰卡凯兰尼亚大学建立合作、交流学习,提升普陀山世界佛教圣地、观音文化中心的地位与影响。

建立国际交流安全机制,抵制宗教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第4款明确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自治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也对宗教合法修行活动给予保护,因此,佛教修行相应地有自己独立的社会活动空间,但是佛教活动也受法律限定,必须遵守国法,自觉抵制一切外来敌对势力的恶意渗透,在1982年19号文件中强调:“我们的方针,就是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持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势力渗透。”“有效抵制宗教渗透关键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为我国宗教顺利开展友好交往提供法律准绳,《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宗教活动场所年度检查办法》、《宗教事务条例》等等一系列国家宗教法律法规都对佛教修行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如“非宗教活动场所不得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来,舟山佛教界爱国爱教,持戒修善,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拥护党的领导,政治认同度高,逐渐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佛教的社会教化功能,真正保证佛教丛林六合清净、法轮常转。

二、新时期加强和改进舟山普陀山佛教管理

的思考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宗教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宗教治理,指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主导,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遵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吸纳信教与不信教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面主体良性互动参与,对涉及宗教的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从之前“宗教事务管理”到现在提出“宗教治理”,经历了价值、理念、政策、体制、手段、方法等多层次的转变,宗教治理更强调价值引领、双向互动和法治精神,预示着我们党和政府在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全新变革。

(一)中国特色佛教管理:引导汉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选择

社会系统随着社会发展始终处于一个不断调整、适应和变革的状态。当今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加之受全球化影响,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不时有宗教问题引发社会矛盾,宗教治理不断面临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普陀山佛教经历过从“香火兴寺”到“文化兴寺”的阶段,经受住受商业化影响降低信仰感召力的危机。近年来,舟山地区乃至全国信仰佛教信众人数呈上升趋势,当前在寺庙中接受皈依的信众数量逐年增多,不分年龄、地域、文化,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热衷于从佛教文化中获得所需的精神慰藉、信仰支柱,出现“多元化”、“广泛化”趋势。与以往相比,中国佛教徒在宗教信仰上体现出较世俗化特点、重仪式轻教义的现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也表明中国佛教复兴运动进入黄金期。“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断引导汉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是在当前暴力恐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愈加猖獗的国际环境下,保证汉传佛教永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当代中国佛教信仰自觉:重构身份认同,参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使命

汉传佛教僧尼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同样肩负着参与社会主义改革的时代使命,“菩萨公民”不仅是僧人的身份表征,也是僧人社会互动的路径,对佛教僧人身份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当代佛教的信仰自觉。近代中国时局震动,原有制度体系土崩瓦解,社会失序,信仰真空,封建王朝覆灭,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个体身份认同的迷茫。当代中国佛教在面临特殊历史情境下开始重新社会定位和功能转型,佛教僧尼们开始重新寻求新的身份,逐渐完成了由“僧伽”到“公民”身份认同的重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国国籍的取得采用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为辅的混合主义原则,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必然是国家公民,只要是国家公民,就能享受公民权利和承担公民义务。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既为推动佛教徒再群体化提供契机,也迎来挑战,社会转型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对于中国佛教各个佛教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制度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普遍提高,服务社会,用超越制度的方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群体,这是中国佛教迈步走向统一教团应当思考的问题。

(三)中国佛教:体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外交观

中国和谐共生外交观的主轴是与周边国家建设命运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东盟国家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这是党中央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构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代表了海内外华人的共同愿景与福祉,是引领当代中国佛教信仰走向的风向标。当代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凝成中国软实力,当代佛教信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人民的佛教信仰需求,培养高度的佛教信仰自觉和自信,积极促进

中华民族大团结,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佛教的认同与接受,努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象。当代中国汉传佛教作为印度大乘佛教的活化石,它能够激活中国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黄金记忆,也是联系东南亚和东北亚人民友好交往的桥梁,中国佛教界肩负着促进中外友好交流民间大使的社会责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支持,”成为当代中国佛教走出去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24.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 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70.
- [3] 方长生主编. 普陀山志[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338.
- [4] 唐忠毛.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
- [5] 普陀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普陀山佛教协会编. 普陀山大辞典[M]. 安徽:黄山书社,2015:71.
- [6] 习近平.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 [7]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
- [8] 李尚全. 人本佛教的当代价值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9] 李向平. 大力加强“中国文化引导”,深入促进宗教发展“中国化”[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 [10] 曾传辉.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宗教治理的回顾与反思[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
- [11] 吴似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思想在舟山的实践——基于新时期佛教皈依原因及信仰现状分析[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3).
- [12]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国家宗教局副局长王作安答本刊记者问[J]. 中国宗教,2007(11).
- [13] 中国宗教编辑部. 普陀山佛教以文化提升为抓手遏制商业化倾向[J]. 中国宗教,2018(1).
- [14] 魏道儒主编. 世界佛教通史(第十四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59.
- [15] 冯今源.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7.
- [16] 习近平. 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3-10-22.
- [17] 中国人大网.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履职学习讲稿:中国宪法制度的若干问题[EB/OL].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8-06/29/content_2057110.htm.

责任编辑:徐晓婷

信教群众的健康管理策略研究

——基于江苏省 A 市 N 区基督教信众的调查

赵骏骏 季国忠

摘要: 本文通过重点访谈和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基督教信众进行调查研究,对基督教信众的健康水平以及健康诉求形成认识,提出对信教人群的健康管理和相关保障措施的建议,为进一步提升基督教信众健康水平,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 健康管理;基督教信众;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672-3163(2019)06-00064-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要坚持预防为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提升全民健康水平。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需要关注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健康水平,其中包含信教人群。

信教人群是指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宗教信仰指的是人们对某种宗教的人格神或宗教教义、仪式等宗教价值目标的信服和尊重,并以这种信服和尊重作为生活和行动的准则。^[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关注信教群众。^[2] 而信教群众的健康诉求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生活方

式不断变化等带来的新挑战^[3],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是健康中国 2030 的必然要求。关注信教群众的健康,加强健康管理的水平,有利于促进和谐的社会氛围,让信教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研究以江苏省 A 市 N 区作为调研地点,选取 5 个场所(1 个基督教堂、4 个基督教聚会点)发放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分别在两个周末基督教信众聚会活动结束后以等距随机抽样方法,向参加教会活动的基督教信众发放问卷;同时以基督教聚会场所所在的社区为调研地点,以偶遇抽样的方法向社区居民发放调查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 750 份,回收率 93.75%,有效问卷 732 份。其中 499 例为普通城市居民,233 例为基督教信众。

(一)性别构成

收稿日期:2019-11-07

作者简介:赵骏骏,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季国忠,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本次调查中,基督教信众男性 43 例,女性 185 例,普通城市居民中男性 201 例,女性 295 例。基督教信众男性占 18.86%,女性占 81.14%,城市居民男性占 40.52%,女性占 59.48%。

(二)年龄构成

基督教人群年龄范围为 18-93 岁,平均年龄为 56.70±13.35 岁,城市居民年龄范围为 18-85 岁,平均年龄 51.35±16.30 岁。(表 1)

表 1 基督教信众年龄构成

类别(岁)	调查人数	构成比
青年(18-44)	31	13.30
中年(45-59)	118	50.64
老年(60 以上)	84	36.05

(三)文化程度构成

基督教信众文化程度由低到高构成比分别为 30.09%,41.59%,18.58%,7.96%,1.77%,城市居民构成比分别为 2.02%,25.25%,30.51%,34.34%,7.88%。基督教信众中,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9.73%,而城市居民中大专或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42.22%。

(四)收入构成

在收入水平方面,基督教信众收入水平占比分别为 51.22%、32.22%、9.76%、3.14%、4.39%,而城市居民占比分别为 15.82%、46.25%、24.14%、10.14%、3.65%。通过对比基督教信众在 2000 元以下的占比,与不信教城市居民在 2000-4000 的占比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8.39, P<0.0001$)(表 2)

表 2 基督教信众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情况

类别	城市居民		基督教信众	
	调查人数	构成比 (%)	调查人数	构成比 (%)
不到 2000	78	15.82	105	51.22
2000 至 4000	228	46.25	64	32.22
4001 至 6000	119	24.14	20	9.76
6001 至 8000	50	10.14	7	3.14
超过 8000	18	3.65	9	4.39

(五)参保情况

由于样本所在行政区,是经过区划调整变为

城市行政区,尽管区划调整时间比较长,但是考虑到该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置参保选项时考虑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情况方面,基督教信众在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医疗、商业医疗保险、无医保分别占比 33.80%、25.00%、32.87%、1.39%、6.94%,而城市居民分别为 82.30%、11.93%、1.03%、1.03%、3.70%。

(六)基督教信众的自评健康状况

在自评健康状况的上,基督教信众自评健康占比从高到低分别是: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较差、很差,分别占比为 42.92%、26.61%、14.16%、12.88%、3.43%。城市居民,占比分别为 44.09%、38.08%、10.82%、5.81%、1.20%。

(七)基督教信众的患病情况

基督教信众有 57.08%患慢性病,城市居民有 45.89%患慢性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59, P=0.0097$);基督教信众患重大疾病者占 22.75%,城市居民有 16.03%。

(八)基督教信众的就医选择

大部分被访者愿意前往社区医院和三家医院进行就诊,分别占比 32.63%和 34.33%。

二、城市基督教信众的健康现状

(一)基督教信众的健康水平

基督教信众的健康水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督教信众的自评健康状况。自评健康是被评价者对自身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是评价人口健康的常用指标之一。^[4]在调查研究中发现,被访者中有近一半认为自评状况一般,还有一部分认为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或者差;另一方面是患慢性病的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人们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慢性病已逐渐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被访者患有慢性病,比普通城市居民患慢性病的比例更大。

(二)基督教信众的健康认识

对于健康是什么,慢性病有哪几种,在何种情况下需要进行就医,被访者仅仅是了解的程度。例如,在询问患慢性病的情况时,基督教信众虽然知

道高血压、糖尿病,但对其他如慢性胃炎、慢性肾脏疾病、慢性关节炎等疾病并不是很清楚。基督教信众中中老年占大部分,其中老年人超过三分之一,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获取信息能力都不如青年人。

(三)基督教信众的就医选择

患病时,被访者愿意前往医院进行诊治,并且更加愿意前往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这与医疗保险政策和医院诊疗水平相关。在社区医院的报销比例与其他医院相比较,因此一部分被访者选择社区医院就诊,同时一部分认为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高于其他医院,则选择三甲医院就诊。

三、基督教信众的健康诉求

(一)信教群众渴望健康

信教群众对健康的渴望十分迫切,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才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信教群众中大部分是老年人,他们健康需求的产生源于其自身的健康担忧,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素质逐渐下降,器官功能逐渐减退,由此产生了健康担忧,进而激发了对健康的需求。他们需要健康的身躯,而这源自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健康的生活环境和优质的健康服务。

(二)需要更多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

被访者中老年人和低学历者是主要群体,因此他们在获取健康知识时,相较于青年和高学历者,需要更加便捷和易于理解的途径。在调查中发现,被访者主要通过电视、社区宣传栏了解健康知识,街道和社区会定期举办一些健康知识讲座,但是在时间上可能与被访者的其他活动相冲突。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信教群众更需要例如健康宣传画册、动画视频、定期上门服务等便于理解的宣教手段,来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健康知识。

(三)需要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降低医疗费用

调查中发现,被访者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虽然是基本覆盖,但有仍近一半的基督教信众认为承担的医疗费用困难。这主要是因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医保政策的影响。根据江苏医疗保险的报销政策,全省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

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分别稳定在 85%以上和 70%左右。^⑨但仅对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费用进行报销,医保范围外的医疗费用对被访者来说仍然是较重的负担。另一方面是收入水平的影响,超过一半的被访者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医疗费用较高,难以承受。

四、基层部门在基督教信众健康管理上的欠缺

(一)对基督教信众健康状况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加强

基层政府部门对基督教信众的健康状况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在访谈基层部门工作人员时,他们对基督教信众的健康状况和健康需求,在普遍性、特殊性和严重性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认识。一是需要进一步认识到整体群体健康状况较差带来的不利影响;二是应该重视信仰对信教群众的影响;三是进一步加强对基督教信众开展健康干预重要性的认识。

(二)基督教信众健康管理的职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宗教中国化发展的今天,基督教信众与一般居民相同,享受同样健康政策,拥有同样的权利。但是在面对基督教信众这一群体时,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关注。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的工作,做好信教群众的管理,也是宗教事务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宗教事务部门与卫生健康部门如何共同做好基督教信众的健康管理,职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

五、政策建议

(一)加强基层信教人群的健康管理

加强基层为基督教信众健康服务的意识。加强对基层工作者的培训,加强他们对基督教信众健康状况的认识。加强基层宗教事务工作者为民众服务的意识,当基层工作者到宗教场所开展业务工作时,通过他们与场所负责人之间的沟通,了解该场所患重大疾病的信众的情况。

明确基督教信众健康管理的职能分工。为基督教信众的健康服务,可以由宗教部门负责联系对接,卫生部门负责活动组织。基层宗教部门掌握

本区域内宗教活动场所的活动时间,与基督教场所进行对接,邀请健康科普专家为基督教信众进行健康知识宣传。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健康科普专家的联系,同时和宗教部门一起围绕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价值观、基督教健康观的内容,为健康科普专家制作健康科普材料提供参考。

(二)加强基督教信众的健康管理

培养基督教信众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基督教信众树立健康理念,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疾病。基督教信众中,患基础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数较多,因此要引导他们不抽烟、不喝酒、科学饮食,提高他们的健康意识。在基督教场所要做好科学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画张贴,帮助基督教信众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结合基督教聚会活动开展科普宣传。考虑到基督教聚会活动与社区开展的健康宣传活动时间可能产生冲突,因此可以专门为基督教信众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在举行基督教仪式前,先由健康科普专家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并且将健康知识和基督教教义中的讲述进行结合,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来解读健康。

借助基督教团体为信众健康服务。基督教团体能够与基督教信众进行更好的联系与沟通,当需要向信教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时,可以通过基督教团体的作用,让信众更愿意参加健康普及活动。同时加强基督教团体人员的培训,提高宗教团体人员对教义传播、人的健康、疾病知识等的认识,为政府部门开展健康普及活动提供辅助力量。

(三)做好基督教信众健康管理的保障措施

做好基督教信众健康管理的经费预算。可以通过设立专项预算,加强基督教信众健康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包括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活动的经费、为基督教信众进行简单健康体检的经费、制作

健康知识普及宣传材料的经费、为基督教活动场所配备健康检测设备的经费、开展场所负责人培训的经费等。

提升基督教信众的医疗保障水平。尽管基督教信众大部分都参加了医疗保险,但仍然有一部分信众没有医疗保障。建议基层部门通过街道社区上门走访、集中宣讲医保政策、定点方便办理等方式,帮助基督教信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确保这一人群的医保全覆盖。

引导场所购置必要的健康检测设备。基督教信众每周约1-2次在场所参加活动,可以引导场所购置血压仪、血糖仪等基础的健康监测设备,有效地帮助基督教信众经常性地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必要时可以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同时加强聚会点负责人设备操作和记录数据的培训,让基督教信众能方便快捷实时的对自身地身体健康状况有了解。

参考文献:

- [1] 杨刘保.城市居民宗教信仰问题分析与透视[J].城市学刊,2015,36(6):68-72.
- [2] 王作安.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EB/OL](2013-11-26)<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6/c1001-23652742.html>
-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J].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17,24(7).
- [4] 王莹莹,郭海健,陈家应.我国农村居民自评健康状况与报告行为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9(6):68-74.
- [5] 金妍宏.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与健身需求研究[J].当代体育科技,2018,8(36):177,179.
- [6] 对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第0803号提案的答复[EB/OL].(2019-6-26).http://ybj.jiangsu.gov.cn/art/2019/8/6/art_71899_8660731.html

责任编辑:徐晓婷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工作

潘国政

摘要:新时代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新定位、统一战线工作领域的新拓展以及巩固团结合作共同思想基础的新要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赋予的新使命,需要社会主义学院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作为教学培训的根本,把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贯穿教学全过程,强化政治共识教育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社会主义学院要紧紧围绕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主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优化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布局,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统战理论、多党合作和中华文化为特色、以“五史合一”为基础、以“五位一体”为专题的共识教育课程体系,形成引导学员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的共识教育学理体系。

关键词: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学院;共识教育;教学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68-05

中共中央颁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第一部由党中央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党内法规^[1],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新精神新要求,是社院开展教学培训工作的法规和依据。随着新时代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新定位、统一战线工作领域的新拓展以及巩固团结合作共同思想基础的新要求^[2],社会主义学院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决策部署作为教学培训的根本,把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作为教学培训的根本目的,强化政治共识教育,提升“用学术讲政治”的能力,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讲深讲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

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

《条例》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民主党派和

收稿日期:2019-10-28

作者简介:潘国政,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务处处副处长。

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9]，肩负着统战人才教育培养的重任和使命，教育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自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一)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对社院统战人才教育培养提出新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开启了统一战线创新发展、巩固壮大的新阶段，也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要求。在今年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汪洋指出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10]，以上四个“前所未有”决定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相应地统战工作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作用愈加凸现。随着我国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这“三个更加多样”直接关系到统一战线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变化、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11]的变化。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生代党外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海外留学人员以及非公经济人士的年轻一代等，由于成长经历的不同，其思想和利益诉求更加多元。中西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不同程度地影响他们对国家、民族政治制度及文化的认知。在这样多元复杂的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如何加强思想引领广泛凝聚共识，是统战人才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社会主义学院要在抓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教育培训的同时，更要根据统战工作范围的拓展，主动向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侨等领域延伸，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广度和深度。^[12]要创新班次设置，突出办学模式灵活性，以进修班、专题研讨班和国情研修班等班次类型实现统一战线领域教育培训全覆盖^[13]，落实“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任务。

(二)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新发展对社院统战人才教育培养提出新方位

习近平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的新论断、“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新要求，是对党的统一战线法宝理论的重大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各族儿女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的“大统战”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统战”在外交领域和全球治理中的延伸。“两个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支撑，更是统战教培工作的战略指针。^[14]社会主义学院应立足“大统战”、“大文化”，将“两个共同体”理论融入统战教培体系，把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共塑良好形象与对内凝心聚力有机统一起来。

在今年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活动中，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希望大家认真总结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宝贵经验，夯实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15]这就是统战人才教育培养工作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学院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献计出力。^[16]

(三)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统战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建设的有关文件和精神赋予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工作新使命

社会主义学院是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致力于共同目标的重要体现。^[17]社院的建设发展和主阵地作用始终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先后颁发了《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明确规定“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学院主阵地作

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院作为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建设和发展。先后发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 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就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工作以及“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12]省委也相应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和规划。

特别是，习近平致中央社院建院 60 周年贺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学院要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努力建设成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成为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13]贺信为社院定了性、定了位、定了向。这是社会主义学院办学的总纲领。201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强调，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部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4]这“五个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学院新时代的性质定位职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高度重视^[15]，赋予了社会主义学院新使命。社会主义学院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社院建院 60 周年贺信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坚持“社院姓社”不动摇，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把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贯穿教学科研全过程。^[16]

二、聚焦“两个过硬”，优化新时代共识教育教学体系

社会主义学院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体，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守党的意识形态阵地，把好政治关，紧紧围绕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主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线，融价值引导、能力培养和理论知识学习于一体，聚焦“培养过硬人才、形成过硬成果”，扎实做好教育培

训工作。按照《条例》要求，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要不断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优化以政治共识教育为核心、以文化认同教育为基础、以能力素质培养为重点的教学布局^[17]。逐步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以统战理论、多党合作和中华文化为特色、以“五史合一”为基础、以“五位一体”为专题的共识教育课程体系，最终形成引导学员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的共识教育学理体系。^[18]

（一）坚持“社院姓社”，强化政治共识和文化共识教育

共识教育是社会主义学院的鲜明特色和立院之本。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社院建院 60 周年的贺信和《条例》都明确指出，“坚持‘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新时代的政治共识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培训要突出共识教育的主业主课地位，把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融入政治理论教育之中大力推进。共识教育的核心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基础，以“大一统”为要义，以问题为导向，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传统，突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历史逻辑，为统战人才厚植文化自信，在增强“四个自信”基础上铸牢“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在强化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增进政治认同。^[19]

切实拓展文化共识教育的新平台，开展以爱国主义为宗旨、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和对外交流活动。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开展国情教育和中华文化研修，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争取台湾民心认同，促进海外侨心凝聚，发挥中华文化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独特优势。面向民族、宗教界等人士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培训，进行文化引领，以文化认同增进国家认同、民族认同，^[2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

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应有作用。^[21]

(二)突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强化统战特色

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理应是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也是社院教学的鲜明特色体现。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时开发体现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发展新成果的课程和教材^[22],精心构建具有社院特点的统战课程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型政党关系、新型政商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宗教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一系列新论述、新理念、新观点,需要引入课堂、武装头脑。^[23]要牢固树立统一战线工作的宗旨意识,开展学员调研、联谊交友工作,了解学员思想动态和履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政策宣传教学。要牢固树立为党的统战工作服务的意识,加大对统战成员的教育引导,确保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了解和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增强五种能力,使他们成为与党亲密合作具备高素质的优秀人才;确保各级统战干部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掌握统战工作方式方法;成为合格的统战干部。^[24]这是社会主义学院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服务统战的作用所在。

(三)立足问题导向,突出国情省情教育

教育培训要直面现实,破解难题,始终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省委省政府工作中心,聚焦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五位一体”为课程模块,讲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把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决策部署等重要内容以及江苏在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及时把“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乡村振兴战略”等内容,充实到课程中,使学员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战略决策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要求上来,有针对性地提高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能力和专业能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又是人民政协70周年,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讲清楚共和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生动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性变革和成就。要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为主题,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坚定“四个自信”。^[25]

三、做好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工作,需牢固树立五种意识

要牢固树立政治大局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把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进,与统一战线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有机融合起来。社院的每堂课都是政治课,要严守政治纪律,政治素质是教育培养统一战线人才的首要标准。^[26]“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对于一切违背和削弱这个思想政治基础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27]社会主义学院要增强政治自觉,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教育培训的全过程,确保讲坛“无杂音”。用学术讲好政治共识,用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引导学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树立守正创新意识。“守正”即是要坚守正道,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核心的内容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守正是创新的根基、主导,创新是守正的活力源泉,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训要把坚持正确方向的定力与勇于创新的自觉统一起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教育培训的内容形式、手段载体和组织管理等。健全以需求为导向的培训内容更新机制,及时充实更新课程内容,特别是按照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的要求,第一时间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的学习,以落实党外人士的

政治教育与中共党员的理论学习同步、相配合的原则,增强教学的时效性。

树立效率效益意识。效率效益的达成需要实现两个层次的融通。一是高素质的教师干部队伍。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政治性、专业性强,需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教师干部队伍,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传统,精准施训,培养过硬人才。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效果导向,要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难点课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围绕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重大实践,增强教学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树立联合开放意识。《条例》提出“坚持联合办学、开放办学”的工作方针,需要以一定的制度机制设计,体现“联合党校”性质并实现联合党校联合办。成立由党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的院务咨询委员会,对办学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和协商^[28],为统一战线各领域参与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展提供平台。尊重统战成员、依靠统战成员。汇集众智、整合资源,形成开放办学合力。牢固树立开放办学的理念,鼓励引导、更好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关心和支持教育培训工作的合力。要重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合理利用高等学校等优质资源、境外培训资源,探索异地、境外培训等方式。大力开发实践教学资源,组织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统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和改革开放前沿,开展实践教学。

树立精品品牌意识。“社会主义学院应当加强学科建设,打造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中华文化等特色学科。”^[29]打造更多具有江苏特色的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中华文化等精品品牌课程,开发一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江苏实践的典型案例和品牌课程,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内涵丰富且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统战教学基地。逐步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核心,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教育课程体系,最终形成引导学员牢记“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和做到“两个维护”的共识教育学理体系。

参考文献:

- [1][2][15]【重磅】六大亮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权威解读! [EB/OL]. 统战新语. 2018-12-28.
- [3][17][20][21][22][24][28][29]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L].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9.
- [4] 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汪洋出席并讲话[EB/OL]. (2019-1-1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1/18/c_1124011488.htm.
- [5] 张峰. 习近平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三大问题. (2015-06-05). http://theory.gmw.cn/2015-06/05/content_15892806.htm.
- [6][7][8][18][19][23] 潘岳. 第十二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会议上的报告[L]. 2017-12-26.
- [9][10]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EB/OL]. (2019-01-2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28/c_1124055281.htm.
- [11][26] 张献生. 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的性质定位 [EB/OL]. (2019-02-11). <http://tyzx.people.cn/n1/2019/0211/c396781-30617919.html>.
- [12] 戴均良. 在第十三次全国社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L]. 2018-12-26.
- [13] 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60 周年的贺信. (2016-10-1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21390.htm.
- [16] 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汪洋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EB/OL]. (2019-06-2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27/c_1124680756.htm.
- [25] 黄坤明. 充分激发爱国热情 广泛凝聚奋斗力量[EB/OL]. (2019-03-3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330/c1001-31004015.html>.
- [27] 张德勇. 擘画最大同心圆共铸伟大中国梦[EB/OL]. (2018-05-20). <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5/20/content.htm>.

责任编辑: 宋好

新时代发挥统战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的路径研究

陈明太 缪文新 裘如君

摘要:发挥统战力量的凝心聚力优势,对于服务南京创新名城建设、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南京市统一战线在整合资源、凝聚共识、服务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但在服务创新名城建设方面也存在着组织作用发挥不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接不够、服务企业不够精准等问题。加快创新名城建设,亟需切实转变统战工作理念、科学开展统战工作定位、积极搭建统战工作平台、着力培育统战工作队伍、不断丰富统战工作形式、加快完善统战工作机制。

关键词:统战力量;创新名城;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6-00073-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2018年1月,南京市出台1号文件《关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到2020年创新核心指标进入全国前列,到2025年成为全球有较强影响力的创新名城。当前,如何大力挖掘各级工商联、民主党派、党外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统战力量的创新潜能,积极助推南京创新名城建设,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我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利用统一战线力量服务城市创新发展的主要做法

新时期统一战线在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在发挥统一战线力量促进创新发展方面作出了许多积极探索,成效斐然。

从外地看,利用统一战线力量服务城市创新发展,大致有三种主要做法。一是活动拓展型。如深圳市以“大统战”视野凝聚各方力量,每年举办深圳市欧美同学会年会,让科技人才创新战略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深圳市还呼应“一带一路”战略,利用侨商资源丰富的优势,重点办好“侨交会”,以“侨为桥”引智引资促贸,助力深圳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枢纽城市。二是组

收稿日期:2019-08-17

作者简介:陈明太,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缪文新,南京市雨花台区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工商联党组书记;裘如君,南京市雨花台区委统战部宣调科科长。

织覆盖型。近年来杭州市针对新社会群体思想活跃多元、社会动员能力强及“体制外”特征突出的实际,通过建设“同心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组织平台,实现了全市 13 个区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组织全覆盖。三是载体依托型。合肥市在创新名城建设上充分依托中国科技大学,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奋力推进“创新、转型、升级”战略。市委统战部连续三年与中科大联合举办“工匠精神”论坛,引导企业家和科研人员崇尚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并不断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服务保障体系,合肥“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呼之欲出。

从江苏省看,2017 年 5 月 20 日,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的首届江苏发展大会在南京召开。作为主要承办单位之一的省委统战部积极邀请 1200 多位海内外知名乡贤,成功搭建起一个联络感情、对话交流、共谋发展的平台,极大地深化了江苏对外交流合作。这是政府搭台、政府主办,但统战部、工商联作为主要参与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非常值得我市学习借鉴。

近年来,南京在整合统战资源,助推创新型城市建设方面也做了许多成功的探索。如,积极推动欧美同学会组织建设,做好全国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千人计划”专家创新服务团来宁开展活动的协调保障工作,较好地实现项目和人才的有效对接;会同市经信委、市工商联开展“千企大走访调研”等系列调研活动,支持各级工商联构建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培训、经贸、融资、服务等平台,努力畅通政商沟通渠道,为全市民营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建立了 1100 名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信息库,打造了一批创新示范点,其中“新领空间”和“南京好朋友”、“青柠盟社区”、“同心圆广场”分别被中央统战部确定为实践创新第一批、第二批重点项目。

二、利用统一战线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政企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创新名城建设的扶持政策难以有效对接

长期以来,南京市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资质较为关注,初创型小微企业因为资质不高很容易被忽视。为扶持初创型科技企业发展,近年来南京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不少企业主反映,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大多从自身角度出发,未能充分考虑企业的实际需求。企业家浏览政府部门网站亦一片茫然,因为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权责和服务内容知之甚少。一些企业家终年忙于业务,也无暇听取相关政策宣讲。面对成千上万家的初创型科技企业,南京市各级统战部、工商联如何发挥联系广泛的优势,瞄准企业发展“痛点”,将辖区各类企业,尤其是小微初创型科技企业走访对接到位、政策宣讲到位、帮扶解困到位,迫在眉睫。

(二)统一战线组织作用发挥不佳导致创新名城建设的智力支撑明显不足

基层工商联,尤其是商会组织建设相对薄弱。与福建商会等异地商会在南京发展红火、企业竞相加入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南京各级商会活动冷热不均,主动服务企业意识不足。一些企业家反映的具体问题长期无人过问,只好自己想方设法解决。同时,基层商会务实做事者寥寥,以至推选会长较难,活动也不易组织,甚至出现一些商会“几千万会费躺着不动”的现象。少数企业家以加入商会作为谋利捷径,与商会宗旨相去甚远。与青年协会相比,一些企业家长期感受不到统战的力量。久而久之,商会组织建设呈现“空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名城建设实质上也是“智力比拼”和“人才竞争”。尤其是,南京提出要打造枢纽城市,建设类似郑州、武汉的“米”字型交通枢纽,根本上就是大力提升南京城市首位度。创新是永恒的主体,围绕“政、产、学、研”全链条,如何集聚创新人才、如何解决人才的居住、教育、医疗等问题;如何让现有政策更好地落地,有价值的建言献策还不多,统一战线智库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新社会阶层人士对接不够导致创新名城建设的人才基础不够牢固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这些集聚在双创园区中的新社会阶层人士没有被充分关注,他们中的许

多人在创业创新过程中始终觉得是“一个人在战斗”。与此同时,各高新园区企业服务人员有限,对接企业服务常常显得力不从心,难以有效地将数量庞大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范围。长期以来,统战工作联系面广的优势在高新园区未能充分体现,在各高新园区成立统战组织、与双创企业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高效对接已是大势所趋。

(四)企业的精准服务不足导致创新名城建设成效参差不齐

一方面,服务不聚焦、不精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出台的企业扶持政策,要么服务过度,纯属锦上添花;要么服务缺位,无法雪中送炭。初创型企业大多无资质,发展困难重重,需要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扶持服务,但园区提供的扶持政策基本千篇一律。不少企业家建议政府部门“既不要过度服务,也不要强制服务”,而应针对“企业个性化问题,在群里一对一服务”。又如,企业减负对规模型企业影响不大,但小微企业的税负却是不减反增,令小微初创型企业举步维艰,不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政策服务和活动服务缺乏绩效评估。目前,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尤其是人才扶持政策难以有效执行。而围绕企业举办的双创活动同质化严重,几乎所有的园区和众创空间都在举办各类内容雷同的路演和创业大赛,对企业帮助不大。

(五)创新环境不够优良导致创新名城建设进程迟缓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来支撑。在调研中,一些企业家感慨,创新创业切忌一哄而生,政府应秉持“不反对、不鼓励”的原则支持双创,而非一味的外在激励,毕竟“创新创业,应是发自内心的人主动去做”。此外,产品招投标门槛设置较高,也在无形中挫伤了企业双创的积极性。如,南京大企业较多,小微企业知名度、影响力太弱。如按同一标准招投标,许多小微科技企业因资质不够必然无法中标,于是“借船出海”,到中西部以合作方式占领市场,反而发展迅速,形成了小微科技企业“墙内

开花墙外香”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更多的小微科技型企业 and 科研院所因为缺少门路,许多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成果长期在实验室搁置,令人惋惜。

三、利用统一战线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的重点领域及主要路径

当前,利用统战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应重点在以下四个领域取得突破:一是创新名城建设中的统战观念转变问题。变则通,通则久。在创新名城建设过程中,统战部门应改变传统观念,大胆创新理念,积极整合资源、借势发展、共生共荣,在创新名城建设展现更大作为。二是创新名城建设中的统战工作定位问题。应赋予新时期统战工作鲜明的时代烙印。统战工作须更多地聚焦精准服务、激励创新、降本增效和优化环境等领域,在创新名城建设发挥不可替代的穿针引线、加油助推作用。三是创新名城建设中的统战资源整合问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开展跨地区、跨部门及跨行业的深度协作,大力整合政企学研等各方资源,凝聚共识、抱团取暖、共同发展,画出加快创新名城建设的最大“同心圆”。四是创新名城建设的统战机制保障问题。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有效服务创新名城建设,须构建科学的对接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方资源的统战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工商联、商会、新社会阶层等全部统战力量为创新名城服务。

积极构建统战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的“小环境”,加快形成全社会服务创新名城建设的“大气候”。当前,利用统一战线力量服务创新名城建设,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六项措施。

(一)切实转变统战工作理念,以全新视野推进创新名城建设提速增效

结合创新名城建设的实际需要,拓宽视野,以“大统战”理念全面促进工作转型。一方面,推进统战职能的全域覆盖。将统战对象更多地向民营企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倾斜,实现统战对象的全领域、全行业覆盖。特别是,要适应形势需要,以同心联盟为载体,积极从民营企业家、外商投资企业

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和社会组织、自由职业者及新媒体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中壮大统战队伍。同时,让他们借助统战资源和力量,实现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增强工商联服务发展职能。通过积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企业需求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反映,多方为民营企业做好贴心服务,引导并推进民企与院校科研院所合作,推进“两落地一融合”。借助统战部、工商联的网络,促进各园区大企业“老树发新芽”,启动助推创新名城建设的大项目、好项目。

(二)科学开展统战工作定位,以重点突破推进创新名城建设落到实处

当前,统战工作要聚焦创新前沿领域,围绕南京行业领军企业,积极盘活存量资源、扩大增量资源,助推创新名城建设提质增效。一是聚焦前沿打造创新“强磁场”。创新依赖有远见的企业家及科技人员。以华为为例,虽然华为云起步最迟,但稳扎稳打,后发优势和引领作用明显。对华为这种“大树”级创新平台而言,其创新必然引领整个行业的创新,并带动高新园区创新要素的凝聚。因此,统战、工商联要更多关注知名企业前沿领域的创新动态,在为它们提供创新便利的同时,鼓励其他中小企业看齐,以知名企业创新的“一枝独秀”带动全市各园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满园春色”。二是盘活存量消除创新“肠梗阻”。围绕企业发展“痛点”,切实帮助非公企业解决难题。三是扩大增量开辟创新“活水源”。城市的持续创新发展,需要取之不竭的创新增量资源。要眼睛向外,紧密对接中央统战部的欧美同学会,利用它们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源,促进更多的企业来宁创新创业、迭代升级,保持南京创新的活水源源不断。

(三)积极搭建统战工作平台,以精准服务推进创新名城建设落地生根

创新名城的基础在企业,企业强则城市强。如何帮助小微初创型科技企业这一城市创新发展的生力军迈过死亡谷、步入成长期?除了积极从外部为小微初创型企业办好融资、减税、教育、交通等具体实事外,我们还应以创新的思维,协助政府部

门搭建有效工作平台,精准扶持小微初创型科技企业内生增长,厚植创新名城的基础。一是加强“智慧商会”平台建设。鉴于工商联人手少、联系面广的实际,可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互联网政务,设计类似于“我的南京”APP服务模块,加强智慧商会平台建设。通过此平台,一方面让南京市及各园区会员企业跨地区、跨行业发布需求,为企业提供市场空间,免费发布产品、服务和技术等,为企业间抱团取暖、共同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认真聆听企业真实服务需求,尤其是产业链需求,进而提供精准服务,增强服务企业的效率。二是打造统战服务企业衔接平台。针对政府企业服务人员严重短缺、企业对政策扶持申报流程不清的实际,可根据企业需求,由市、区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负责衔接并对接政府部门,也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由众创空间、孵化器等企业运营单位承接服务,从而能够较好地解决政府企业服务人手不足的难题。三是创设产品订购定制平台。积极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穿针引线,推荐使用创新的技术、创新的服务和创新的产品,扶持初创型小微科技企业发展。特别是,鉴于政府招投标知名企业利润空间较大、小微企业难分一杯羹的现状,统战、工商联部门可在调研的基础上,列出政府采购订购定制清单,建议政府采购适度向南京市本土小微科技企业倾斜。同时,根据政府公共服务需要,如智慧小区建设,可由政府组织部分小微科技企业联合设计开发技术集成类产品,尽快将这些企业的技术产品落地,避免企业技术专利长期闲置,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小微科技企业发展的“双赢”。

(四)着力培育统战工作队伍,以中坚力量推进创新名城建设充满活力

加快创新名城建设,客观上需要加快培育一支业务精、思想活、愿奉献的统战工作中坚力量。为此,一方面,高质量建设商会小镇,实现新时期统战工作新作为。借鉴浙江互联网小镇和海南博鳌论坛的示范效应,立足南京企业发展需要,建设一批商会小镇作为创新名城建设的有力抓手。按

照“班子建设好、团结教育好、服务发展好、自律规范好”的标准,推选一批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优秀企业家担任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并对商会小镇的建立和运作进行规范化业务培训。带动全市商会围绕会员企业“痛点”开展战略合作,助推创新名城建设的全面提速。另一方面,多渠道壮大新阶层人士联盟,努力集聚创新人才资源。加快创新名城建设,核心是做大人才基数,尤其要集聚“五名城”的各界精英。为此,市、区两级统战力量要充分发挥聚焦人才的天然优势,既要借助智慧商会平台集聚区域创新人才资源,也要通过各类社会组织联合会、外商联合会、基金、企业和中介机构等组织,不断扩大新阶层人士联盟,使新阶层联盟成为助推创新名城建设内生增长的中坚力量。

(五)不断丰富统战工作形式,以多种活动推进创新名城建设提升层次

应充分借鉴一些新型商会和社团的做法,丰富活动内容、活跃活动方式,保持统战力量服务创新名城的新鲜活力。一方面,采取多种推介形式,增强统战活动吸引力。重点在宣传渠道、宣传内容、宣传方式及运用自媒体上下功夫。尤其是,要善于把握青年科技人才的身心特点,多用诸如“抖音”这样的时尚方式去联结年轻人,吸引他们回归到商会、工商联行列,成为统战力量的新鲜血液。同时,借鉴青协做法,为科技企业家举办学习培训、建立企业家社群,不断扩大小微科技企业主的“朋友圈”,引导他们投身南京创新名城建设。另一方面,打造创新品牌项目,提升统战工作贡献度。围绕创新名城建设,打造富有统战特色的创新品牌项目。如,发挥统战赋能优势,整合工商联资源网,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作为投资人,扶持有技术、想创业但无资金的小微企业发展;借助双创服务中心,帮助小微初创型及成长期企业提供辅导培训、技术交流、招聘人才、开拓市场及股权、债券融

资;启动双创基地直通车,开展创新政策宣讲、政策对接等。

(六)加快完善统战工作机制,以科学保障推进创新名城建设行稳致远

企业竞争是全方位的、持久性的竞争,根本上取决于企业的内生生长力。为此,统战力量要构建科学的保障机制,充分对接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方资源,共同为创新名城建设助力。一是构建动态统战资源库机制。根据创新名城建设需要,构建统战资源库,形成统战服务创新发展的项目信息、人才集聚、资本供给、市场需求等资源库,并经常性对统战资源库进行跟踪并更新,持续为创新名城建设献计献策。尤其是,要发挥联系面广的优势,分门别类建立行业上下游资源群,为小微初创型科技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便利。二是构建统战对接政府部门有效服务企业机制。要多设身处地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着想,多在产业发展引导、加强政企互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企业争取利益等方面有所作为。包括:配合政府部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明确指引;对接政府部门参与企业宣传推介活动,“把企业的活动变为政府加持的行为”;呼吁地方政府切实为中小企业减负,要让企业在国际化竞争中通过降税来提振信心、增强竞争力。三是优化双创项目审核及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扶持杠杆作用,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创新项目审核机制,严格把关创新项目,对套取政策扶持的虚假新型研发机构进行打假,确保将有限的创新扶持资金用在扶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创新引领作用强的优质项目上。同时,参考创新券模式,对初创型企业发放“创业创新券”,并通过引入第三方金融机构,提高“双创券”的兑换时效和政策资源的使用效率,激励初创型小微科技企业成为创新名城建设的生力军。

责任编辑:王天海

文旅融合背景下博物馆研学活动 对其文化价值提升的作用

——以中国科举博物馆 2017 年运营以来的研学活动为例

蔡颖

摘要:在当前文旅融合的背景下,博物馆开始由收藏展览中心向传播知识与文化的教育中心转变,发挥教育功能的研学活动也对博物馆自身的文化价值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中国科举博物馆 2017 年运营以来的研学活动为例,具体分析了其对于科举文化传播和传统文化继承方面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文旅融合;中国科举博物馆;研学;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6-00078-03

一、文旅融合概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产业之间的界限和壁垒逐渐被打破,产业之间出现融合发展的趋势,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便是其中一个例证。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能促进旅游产品提升,而旅游能促进文化广泛传播。旅游是文化实现产业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文化则为旅游产业品质的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着力发展的两大支柱性产业,由于在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创意、文化消费者等方面的共通性,两者逐渐突破产业边界而融合发展,逐渐形

成交叉产业、新兴业态,延展了各自的产业边界,丰富了产业发展的内容。国家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政策的陆续出台,为两大产业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外力的支撑和推动。^[1]

文旅融合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两大产业的转型升级,形成文化旅游产业业态,而且还推动了经典文化资源产业价值的提升,利用经典文化和遗产不仅可以增强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而且也能够不断满足旅游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元化的文化旅游需求。因此,我们要强化以文促旅,用文化提升旅游品味,以文化要素的注入推动旅

收稿日期:2019-08-27

作者简介:蔡颖(1978-),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游个性化、特色化、品质化发展,强化以旅彰文,用旅游载体传播文化,推动博物馆、非遗传习所、古籍展示馆、考古遗址等纳入旅游线路,推动文化发现创造价值与旅游体验分享价值有机结合,打造更多文旅融合产品。

二、研学旅行的发展

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发展改革委、文化厅(局)等11个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研学旅行正处在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期,要把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意见》明确了研学旅行的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组织保障等,提出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为研学旅行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2]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研学旅行在全国教育机构和学校得以全面推进。

研学又称为“研究性学习”,是在传统游学的基础上,把教育场所由封闭的学校课堂移向开放的自然,把大自然和社会作为研究、学习和亲身体验的场所,研学旅行即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游、集中食宿方式展开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3]研学旅行使中小學生走进社会、亲近自然,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是学校教育有益补充,是教育教学的崭新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

三、中国科举博物馆2017年运营以来的研学活动

(一)中国科举博物馆简介

中国科举博物馆位于南京夫子庙核心区,原本是江南贡院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鼎盛时期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2万多名考生同时考试,明清时期从这里走出去的名人比比皆是,被人们称为“古代官员的摇篮”。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千年化石和兴衰成败的历史见证,也是科举制度文明的有形遗产。

现在的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以江南贡院历史遗迹为基础,在修缮和保护明远楼、飞虹桥等历史遗存的前提下建设而成,是全国最大的科举文化专题类博物馆。博物馆占地2.63万平方米,主体建筑全部位于地下,四周环绕竹筒,就像一个“经匣”,博物馆的屋顶设计是“墨池”,池中的水静如明镜,有着“以史为鉴”的寓意,四方形的设计象征了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博物馆包含为国求贤、鱼龙变化、金榜题名、金陵佳话、源远流长五大展区,集展示、研究、教学、交流、旅游等功能于一体,向观众展示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发展史,讲述了古代士子从寒窗苦读到鏖战科场到中举做官的心路历程,博物馆的目标定位是打造中国科举文化体验展示中心、科举文物保护中心、科举制度研究中心。

(二)中国科举博物馆2017年运营以来的研学活动

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不仅牢记“教育是博物馆的灵魂”,更以“发挥博物馆教育优势,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理念为宗旨,全面打造科举文化研学基地,开设了丰富多彩的学生社教活动。2019年以来专门定制了“状元及第”“状元是怎样炼成的”“穿越古今,探秘科博”以及“国学礼仪,启智人生”四项研学活动,吸引众多的青少年走进科举博物馆,激发他们的审美情感,提高创新意识。

大型研学团活动“状元及第”是在参观博物馆的基础上增加的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了解科举制度发展的历程,了解古代士子科举取仕的艰辛过程,弘扬科举的至公精神,珍惜当下学习条件。还通过观看影片《千年科举梦》、魁星堂祈愿、号舍体验、多媒体互动、文物福袋体验、投壶等体验活动,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在探究合作中,学会设计、创作和反思。此活动针对200人以上的团队。最富特色也最受欢迎的是小团体定制活动“状元是怎样炼成的”,此活动细分成17个主题,兔子灯、雕版拓印、活字印刷、线装书缝制、香囊缝制、荷花灯、秦淮诗词赏析、武举、探宝、亲供单、捷报、金榜题名、“鱼跃龙

门”水彩画、魁星点斗、状元书法描摹、家规家训、剪纸。青少年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项或者多项活动参与研学。“穿越古今,探秘科博”是馆校合作项目,课程内容结合了中国科举博物馆的五大展区,分成了五个模块,以科举的纵向和横向的发展为脉络编写教材,同时也将融入相关传统文化体验课以及多种教学方式。目前此活动主要与南京市夫子庙小学合作,选取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分上、下两个学期学习:上学期有 6 个课时在博物馆进行学习,10 个课时在学校进行;下学期有 4 个课时在博物馆进行,12 个课时在学校进行。这是一个新型的课堂教学模式,有这样多学科形式的融合,使得博物馆成为无边界的课堂。而“国学礼仪,启智人生”属于私人订制礼。课程分为开笔礼、成长礼、状元礼三个部分。学生在博物馆进行“朱砂启智”“启蒙描红”“独占鳌头”“登台受教”“鱼跃龙门”等仪式。由于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因此广受中小学生的青睐和好评,自运营以来已接待研学学生数万人次。

四、中国科举博物馆研学活动对其文化价值提升的作用

(一)对科举文化的传播

科举制无疑是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科举文化遗产具有传统考试文化的性质;科举文化遗产具有儒学文化性质,与儒学教育共浮沉;科举文化遗产具有民族语言文化的性质,其中以汉字文化为主要载体。^[4]

学生在研学之前先观看一场《千年科举梦》的电影,了解古代士子科举取仕的艰辛过程,提倡儒学选贤任能、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基础,弘扬科举的至公精神。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了解科举考试即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考试内容和取士标准,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性与艺术性,反映了鲜明的汉语汉字文化特色。在参观完博物馆之后进入到号舍进行体验,号舍面积大小不足 1.5 平方米,考生在其中要待上九天六夜的时间,其位置分上下两块木板,白天板分为上下,即为桌凳,用来答卷,夜间要将上面的板子抽出,与下面的板子拼在一起,

蜷曲在上面睡觉。学生们可通过亲入号舍体验古代士子艰苦的考试环境。

另外,中国科举博物馆推出的公益讲座《科举与当下》《江南贡院的历史地位》《科举与中国文化》《从江南贡院走出的历史名人——翰林院编修金口》等都对科举文化的解读与传播起到了启发与引导作用。

(二)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在博物馆研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始终是教育重点。如小团体订制活动“状元是怎样炼成的”中 17 个主题,无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雕版拓印、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一针一线,一传一承”线装书缝制、还是“正月里的流光溢彩”荷花灯制作、“诗词小达人”秦淮诗词赏析、民间传统工艺剪纸,无一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也体验到了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而多样化互动项目的开展,可以充分挖掘博物馆文化教育的功能,将博物馆真正打造成为孩子教育学习的第二课堂。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提高了博物馆研学活动的效果。

文化内涵是中国科举博物馆的主要资源优势所在,而科举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其资源禀赋,通过研学活动提供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突出文化个性,并进一步提升文化形象,发掘科举宝藏,汲取科举文化的养分,以古鉴今,连接起古代科举制度与当今社会的选拔制度,彰显科举文化的现代价值,实为文旅融合背景下提高经典文化产业价值的正确方向。

参考文献:

- [1] 厉建梅.文旅融合下文化遗产与旅游品牌建设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6.
- [2] 张加欣.我国研学旅行的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J].课程教学研究,2019(7).
- [3] 任丽斌.研学旅行课程设计的问题与对策[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8.
- [4] 张亚群.论科举文化遗产[J].厦门大学学报,2006(2).

责任编辑:王芳